



历史上汉阳是武汉中心城区建城最早的，商贾云集、老街巷众多，西大街是其中很有名的一条商街。这张照片拍摄于显正街与西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习惯称西门口，往北走是北城巷，往南走是南城巷。照片右侧现已建成汉阳树公园。这组照片出自我的纪实摄影作品《大城根脉——聚焦武汉老街巷》，荣获2019湖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我是一个老武汉人，见证了城市的高速发展，也深知在发展中对老街巷的保护不够。我的拍摄不单纯是摄影，是把摄影和传播、保护、利用结合起来。摄影对我来说，是爱好，是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一生的情怀。

(摄影 / 撰文 麻建雄)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 菲 杨 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张智勇 陈胜利
陈红英 林 伟 谭艺琴 潘红莲
燕来宾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刘 玮

编辑：许 濛 章旷怡

封面设计：王 鹏

时代年轮

<<< <

4 1984，格里希在武柴“吃螃蟹”

——我给“洋厂长”当助理之一 / 李 兵

风雨同舟

<<< <

15 我为钢铁行业建言 / 牛琳霞

九城同心

<<< <

19 金桥越天堑 通途润民心

——武穴长江公路大桥建设纪实 / 张建军

委员天地

<<< <

25 “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缩影”

/ 邱 玲(口述) 章旷怡(整理)

29 红旅线上政协情 / 余红华

商聚汉皋

<<< <

33 智能天窗，透入我人生的光 / 孙汉超

目录

CONTENTS

人物春秋

<<< <

- 37 黄际遇在武昌高师创建现代数理教育 / 林才伟
44 “汉口中学”校友台静农 / 张爱清

史海钩沉

<<< <

- 46 民间文献《灵泉志》中的明楚昭王墓营建（上）
/ 李 贝 宋 贝 李绿雨

往事漫忆

<<< <

- 52 父亲童世光的入党介绍人王平章 / 童晓晋

都市史话

<<< <

- 55 说“不服周” / 朱建倾
57 “不服气”来自京剧 / 姜照中

高校访馆

<<< <

- 61 楚菜文化与国际赛马的奇妙组合
——武汉商学院校史馆 / 范 勇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1984，格里希在武柴“吃螃蟹”

——我给“洋厂长”当助理之一

◇ 李 兵

轮印：1984年11月1日，武汉市聘请联邦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格里希（Werner Gerich）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首开中国国有企业引进西方人才的先河。格里希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洋厂长’”，带来欧洲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理念，为推动中国企业改革做出有益贡献。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10位国际友人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格里希名列第二。

1984年9月21日，格里希来到武汉柴油机厂从事管理咨询顾问工作，11月1日就任厂长。8月下旬，武柴指派我担任格里希的助手，直到他1986年11月卸任，由此

亲历“洋厂长”在中国“吃螃蟹”的全过程，并与之结下深厚友谊。

当顾问萌发念头“当厂长”

1982年10月，武汉市与德国杜伊斯堡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签署了《武汉市和杜伊斯堡市关于退休专家咨询服务的原则协议》。杜伊斯堡在德国退休专家局SES的支持下，向武汉优先推荐一批专家，来武汉对口到政府部门或企业工作，工作周期从两周到四个月不等，根据需求调整。

首批三位德国专家是在1983年来武汉工作的。这年秋，武汉市政府在一次会议上，



1984年春，格里希（右一）在波恩 SES 总部参加培训

向市属企业传达了可以邀请德国专家短期工作的信息。武柴随即向市政府和德国 SES 提出申请，方向是优化 S195 柴油机的燃烧室设计，将涡流式改为直喷式，以提高性能和质量，如燃油耗、震动、机油耗以及输出功率等。

我于 1982 年 2 月从华中工学院船舶内燃机制造专业毕业，4 月分配到武柴设计科第三室工作。一天，厂部安排我就德国退休专家来厂短期工作事宜，与市政府相关部门联络沟通，提交申请材料。

德国 SES 接受了申请，安排 64 岁的退休工程师格哈德·赫尔德承担该项咨询和燃烧室设计改进工作。赫尔德是柴油机设计专家，早在 1962 年就开始在德国一所著名机器制造公司从事柴油机研制工作，长达 20 年。但由于他不能在我们计划的时段来武柴，德国 SES 总负责人诺德希克推荐了格里希，建议由他先来武柴 4 个月左右，从事管理咨询顾问工作。

格里希积极为中国之行做准备，参加德国 SES 的退休专家培训班，初步了解中国的语言、历史、经济发展等基本状况，又专程前往杜伊斯堡拜访了市长克林斯和办公厅主任克莱默尔，进一步了解武汉的基本情况。

1984 年 8 月下旬，武柴厂部会议决定 4 位工程技术人员配合格里希工作：副总工程师吴琴心负责产品设计，工艺科长文远海负责产品制

造工艺，厂部工程师吴维翰负责与市外办联络协调，我作为工作助手全天候跟随格里希工作。

格里希的顾问工作期限为 4 个月，但他从顾问到厂长仅 40 天，而冒出“要是我来当这个厂长”的念头则不到 10 天。这一“转岗”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9 月 21 日到 30 日。

9 个工作日内，格里希深入走访武柴所



1984 年 9 月，格里希组织讨论他在车间察看的情况，左起：厂部吴维翰工程师、吴琴心副总工、质检科孙昌发工程师、作者李兵、德语翻译余维浩

有生产车间和相关技术科室，了解掌握全厂生产、技术、设备、工艺、劳动管理等方面的状态，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他写出 10 多万字的工作日志报告，由余维浩翻译成中文，分别呈交德国 SES 总部、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和政府相关部门。

这期间，武柴厂级班子的工作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整顿的验收上，因而与格里希的工作会晤不多，大约一周一次。偶尔，格里希有些急需解决的事项，临时约见一下党委书记和总工程师，但效果不太明显。应当说，对格里希的初期工作，武柴厂级班子是不太重视的，有时一起开讨论一下，但实质性的配合则另作他论。但武柴厂级班子没有料到，作为顾问的格里希，工作是如此认真；格里希也没有想到，作为厂级班子的管理层，对他是如此不重视。

面对这样的局面，格里希按其德国工程师的思维感到不快。他在德国及其他国家担任过飞机制造厂的厂长或厂级负责人，对管理一家制造工厂是有经验的，同时还是一位机械方面的专家。来武柴当顾问，他与德国 SES 签订了合约。在他看来，既然签了合约，就要把发现的问题记录下来，连同解决方案一起提交给武柴及其上级管理机构。如果方案是正确的，就应该立即执行并纠正错误。

然而，格里希感到他提出的问题，没有人去积极实施改进，敷衍之态明显可见。他觉察到，要解决他所列出的改进事项，不仅仅在技术管理层面，而且要上升到企业管理层面。如果管理层没有动作，不接



1985 年 4 月 8 日，格里希在现场组织讨论给曲轴回油孔倒角工艺问题

受或不执行他提出的改进意见，那么他的工作就是白费。

格里希的这种思考，渐渐显露于他给武汉市政府的报告中，偶尔在口头上也冒出“要是我来当厂长”的说法。

第二阶段：10 月 1 日至 20 日。

2009 年 11 月，格里希当年的翻译余维浩回忆：“1984 年过国庆节，市里专门为格里希在胜利饭店搞了个招待酒会，吴官正、丁华、裘法祖及夫人都来看他。那个时候格里希还是顾问。武汉市越来越重视他，老头子的地位越来越高，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冲。一说到武柴，他的劲儿就来了，像开闸放水一样说不完。市领导和他坐在一起，他突然就冒出一句话来，‘要是我来当武柴的厂长，我就要怎样……’”

格里希“当武柴的厂长”这句话被市外办盯住了，向吴官正市长汇报，并与有关方面沟通。武汉市领导层很快统一了思想，市委书记王群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领导汇报，得到了肯定的答复。10 月中旬，市外办主任丁华找余维浩，让他试着问一下

格里希：假如武汉市聘请他当武柴的厂长，干不干？余维浩问了格里希，他却没有马上答应，此后也数次谢绝。

那段时间，格里希也生病了，在同济医院断断续续住院治疗6天，他在日志中是这样记录的：

“1984年10月12日上午8:30，武汉市外办阮继清副主任到胜利饭店来看我，因感冒我躺在床上。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柴油机厂厂长的任命。将授予我全权，并能得到武汉市政府的支持，任期为一年。当时我着重指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光荣，但我不能接受，因为我与退休专家局（SES）仅定了工作4个月的协议，SES与杜伊斯堡市亦有一个协议。无论如何我必须遵守这一协议。

“我还得与我的夫人商量一下。所以，尽管这对我是一种荣誉，但我还是不能马上做出肯定的答复。毕竟我已是65岁的人了，孤身一人在中国过一年，夫人也不可能立即同意的。即使她来探亲一次，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我向阮主任表示已做好准备，在我工作的4个月内，将如同过去的一个月那样，把所有的一切才智投入到改进柴油机质量和改善工厂状况的工作中去。”

我的日记中也有如下记录：

“10月13日，余维浩告诉李兵，市里有考虑让格里希先生在武柴当厂长，管理和运作这家工厂。

“15日，余维浩告诉李兵，市里已通过决议，同意请格里希为武柴厂长。目前正准备派人去京向邓小平汇报。

“19日下午3点，市外办来人了。与格里希谈任厂长的事儿。最后决定格里希先在余下的三月中任武柴厂长；至于以后，待格里希回国一、二个月后回来再继续干。”

格里希日志还有这样的记录：“10月19日，市外办阮先生和哈尚文先生为聘请我当一年厂长之事，到武汉柴油机厂来拜访我。我没有接受聘请周期为一年的建议。4个月的聘期满后我就回德国去，然后再做出是否接受聘请一年的决定。”

第三阶段：10月21日至31日。

在此期间，应市外办的要求，格里希提交了一份《关于整顿武汉柴油机厂的计划方案》。同时，格里希表述他有条件的接受武汉市政府的提议，出任武柴厂长，任期三个月。“10月21日，根据市外办的阮先生的要求，我写了一份关于整顿、改革武汉柴油机厂的报告。当天下午2时，同武汉市机械局的傅先生和胡先生，就这份报告进行了交谈，决定聘请我为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

随后格里希又生病了，在同济医院住院6天，在病床上起草“就职演讲”，一边治疗一边策划出任厂长的准备工作。

当厂长从“工资制度改革”开刀

1984年11月1日上午9时许，格里希就职大会在武柴俱乐部举行。吴官正市长来了，市经委、计委、外办、机械局的代表和武柴2000多名职工挤满会场。人民日报、新华社、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10多家媒体记者蜂拥而来。吴官正市长宣读聘书，格里希发表就职演说，热烈的掌声在大厅回荡。

格里希就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是1949年以来国有企业首次聘请西方发达国家公民担任厂长。他的厂长任期数次延续，直到1986年11月4日卸任。

武汉市委、市政府给予格里希以极大支持，向武柴派驻一个指导小组（简称“四人小组”），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李梅



1985年1月8日，格里希在厂房中的卡车上宣布工资改革方案

芳任组长，市经委副主任郑仲衡、市纪委副书记刘善壁、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胡际友为成员。

11月中旬，在四人小组的支持下，格里希撤换了武柴总工程师赵海音、质量检验科科长张福生，任命了新总工程师文远海，调整了质量检验科管理班子：科长卢祖振，副科长文国胜、曹小麓。

1985年4月中旬，市机械局对武柴管理层进行调整，卢祖振任党委书记，黄忠韵为中方厂长，文国胜为负责销售的副厂长。直到此时，武柴管理层才形成一致支持格里希工作的局面。同时，对车间一级负责人进行了微调。

上任厂长不久，格里希通过现场调查和劳资科信息，发现武柴的薪酬制度没有体现“按劳付酬”，而是“按工龄付酬”。因而，他四处呼吁，得到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同意，在武柴试点“工资改革”。

1985年1月8日，格里希在武柴三车间到五车间的大型框架厂房走道上，开进一辆卡车，作为全厂大会的主会场讲台，向全体员工宣布工资改革方案。

1986年春，应市政府要求，格里希起草《对武汉柴油机厂的改革方案》，这是一份调整武柴管理体系、提升生产效率的重要文件。这一方案的核心内容，1987年由企业管理出版社以《格里希在武柴》为名出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为之作序。

1985年初，格里希向武汉市相关部门提出，更新换代制造设备，以进一步提升柴油机质量，同时兴建职工宿舍楼、购买上下班用的通勤交通车。5月，武汉市政府同意由银行贷款302万元，用于设备更新换代。7月，国家经委拨款500万元用于设备升级，而将武汉市的302万元技改贷款用于兴建职工宿舍。

1986年5月26日，武柴三栋宿舍楼开



1986年5月26日，格里希出席职工宿舍开工仪式

工，格里希在合同上约定当年完工，他说，“今年的圣诞节前，我要再次来到中国，来看到这几栋新楼房的完工……”

在此期间，市外办协助安排格里希到中国多个城市访问交流。参观一些企业后，格里希认识到：武柴的实际生产和设备状态在中国不是顶级企业，而是处于中游偏下水平；中国有许多好的军工企业和国有企业，如同样是生产单缸柴油机的常州柴油机厂和无锡县柴油机厂等。同时，基于感受到的一些普遍现象，格里希利用与国家领导人会面的机会，提出了许多有重要分量的改革建议。

抓质量从点点滴滴做起

格里希在武柴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全天跟随他，及时记录他提出的工作指令，准确传达到车间和科室，并按时反馈处理结果，使他能迅速掌握第一手动态信息。

我在格里希身边认真观察学习，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在较短时间赢得了他的信任。有时候，他不仅是让我传达到位，还让我临时担当“钦差大臣”。

1984年11月10日早上6点，格里希在总装车间检查一批待总装的气缸体，发现气缸体上用来固定水箱的螺孔钻穿了。他请来有关领导到现场，告知这是一起质量事故，有关领导当即表态采取措施补救。

下午4点，格里希带着我又去总装车间，检查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补救、是否完成。现场查看后，他不满意补救措施，认为是敷衍，又让我把负责生产的钟副厂长和工艺科文科长找来，讨论正确的返工办法。同时，他让余维浩给市机械局胡副局长打电话，反映这一起质量事故。

第二天，格里希对现场约300台柴油机的水箱螺孔进行检查，并对质检科检查过的柴油机进行复查，发现质检科的检查是马虎的。格里希在工作日志中写到：“事实证明问题绝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以前早有发生过，造成这类事故的根本原因是无人关心这方面的质量问题，质量检查员也没有认真检查。这批有问题的气缸体数量达到259个以上。”

格里希对现场的质检员也不信任了，指定我担当临时总质检员的角色，当场宣布：“在返工完成后，须由李兵在现场做最后的检验，合格后方可放行。”

4天后的11月15日，格里希免去了质检科科长的职务。

格里希注重规范，工作态度严谨，要求从身边人做起，手把手教我书写阿拉伯数字，就是一个绝好的案例。

11月7日，格里希布置我一个任务，抽查10台柴油机的机油清洁度，要求必须从头至尾完成所有流程，并将数据报告给他。第二天上午，我到质检科金相实验室取到10台柴油机的清洁度的残渣样品，抄录了称重的数据，回到了格里希办公室交给他。

格里希拿着这张数据单看了一会，拿出一张纸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向我报告的任何工作数据，都必须按照我现在教你的样式来书写。”他在纸上写下从0到9的阿拉伯数字，形如下图：

0.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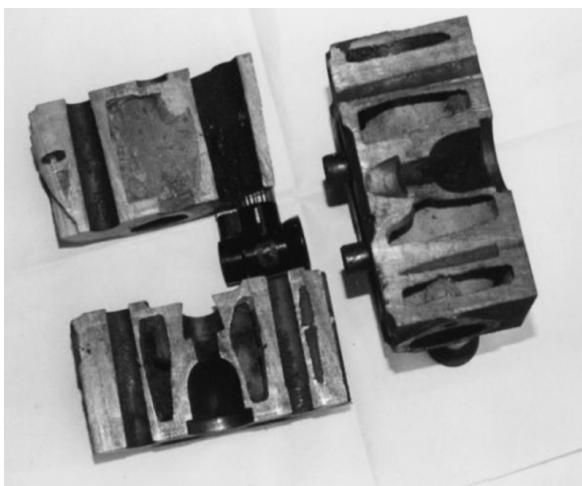
5. 6. 7. 8. 9.



1985年5月，格里希指导作者李兵工作

可以肯定地说，我是武柴被格里希唯一这样教过的学生。接着，格里希又告诉我，如果在现场抽取柴油机零件作为样品，必须当场在零件上编号，用油漆或记号笔工整书写数字，还要在数字的右下方标上一个圆点。这样，“6”和“9”就不会混淆了。

还有一类工作，当格里希找不到合适的人员或部门时，就要求我去处理，如解剖柴油机的气缸体、曲轴和盖头等，以致常态化，旨在察看铸造零件的内部状态是否符合图纸要求。



这张照片是格里希1984年11月中旬拍摄的，保存在他整理的“格里希相册”中。那天，我按照他的要求，解剖切割从“三包服务队”返修柴油机上拆下的气缸盖头，检查内部状态和铸造芯模的尺寸，进行相应分析。

有时候，格里希和我一起到铸造车间或三车间现场抽样编号，然后拉到铸造车间下料组切割。另一种场景是，格里希在胜利饭店早餐前后想起某件事，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当他乘车来厂的时候，我已把解剖好的零件摆到碰头会桌上，以便他与大家讨论处理。

1985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格里希召开会议，严厉批评铸造车间主任詹玉荣。一天前，格里希通过日报表，发现铸造车间生产出的柴油机机体出现大量不合格品，追究原因是机体造型生产线上的泥芯盒变形。他知道，泥芯盒没有备件，马上赶到工具加工车间，找到车间王主任，要求在当天晚上9点前，赶制一副新泥芯盒。工具车间当天下午4点做出泥芯盒，并及时交付给铸造车间。

可是，当格里希在会上询问“新泥芯盒的使用情况怎么样”时，詹主任回答：“今天上午，因为处理一件事情，忘了安排把生产线上的泥芯盒换上新的了。下午呢，因为又赶着来开会，还没来得及安排。”

满以为新泥芯盒已投入使用的格里希一听，顿时生气了，他几乎咆哮着说：“为了我们厂的产品质量，我急得吃不好饭睡不

好觉呀。昨天我是亲自安排了这件事，想让它尽快投产。可你们自己呢，却耽误了 21 个小时！21 个小时啊，真是不可思议……”

新泥芯盒的使用环节人为中断 21 小时，直接影响几十台柴油机的质量。格里希对一些管理人员对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不关心、不在乎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

6 月下旬，格里希来到三车间抽查，拿出一个磁铁棒，在完成下线的机体中仍然吸出一些铁屑，向车间主任陶维顺展示。由此，他要求在加工生产线末端，增加一道“高压气吹铁屑”的工序。

卸任后表扬武柴三位女士

1986 年 11 月 14 日，格里希已卸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在他回德国之前，武柴举行告别欢送会。

格里希在会上讲话，开场白就是“经常见到的三位女士，今天只见到了一位。希望三位女士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也希望在座的先生们今后多深入实际、少坐在办公室里，把工作做好。”

格里希提到的三位女士，在过去两年与他配合工作的过程中，其工作作风、效率、技能等受到他的赞赏。这三位女士是：副总工吴琴心，质检科长曹小麓，工艺科工程师胡纯梅。

这里讲一下胡纯梅的故事。格里希来武柴时，胡纯梅是工艺科负责总装车间的工程师，负责与格里希的相关工作衔接。



1985 年 6 月，格里希向三车间主任陶维顺展示抽查情况

1984 年 11 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格里希来到总装车间装配线上，看到几台装配中的柴油机机体内腔不清洁，有铸造的残砂和机加工的铁屑，马上在这几台柴油机的后盖做了标记。当天，这些做了标记的不合格柴油机却仍然装配完成下线，放置到成品柴油机车棚里。下午，格里希看见这些柴油机与合格柴油机混放，要求胡纯梅立即督促返工。

第二天早上碰头会，格里希问胡纯梅，“那几台柴油机返工了吗？”胡工回答说返工了。会后，胡工忙着处理其他紧急工作，格里希却到了总装车间现场，把一台有标记的柴油机后盖拆开检查，与原来的状态相差不大，仍是不合格。再拆开一台，没有返工好，又是不合格，一下子就生气地跳了起来训斥。

胡工赶到现场，赶忙与工人一起重新返工，直到格里希觉得满意。

通过处理这件事，胡工适应了格里希严谨的工作作风。此后，每当格里希布置工作的时候，她总是格外认真地做好记录，并马上到现场逐一落实完成。

胡工的工作得到了格里希的肯定，他



1984年10月，在试车房外柴油机成品停放处，格里希和胡纯梅（左一）分析试车时燃油耗过高的原因

多次表扬胡工说，“要是武柴的工人、干部都像你胡工这样工作就好了”。

几周后，又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事”。这天，胡工没有参加早上的碰头会，格里希关切地问：“胡工到哪去了？”其他人说：“胡工在她的工艺科办公室里，今天很忙。”会议结束之后，格里希叫上我，悄悄跑到胡工办公室附近一探究竟。我们没有从正门进入胡工办公室，而是站到工艺科后窗的洗手池上悄悄观看，胡工正在办公室绘图。

好了，格里希知道胡工的确在工作，也确定碰头会上没人糊弄他，满意地从洗手池上跳下来。因为常有人遇事找一点由头搪塞，格里希心知肚明，所以要专门落实一下。

动真格与英国公司“打官司”

1984年底，为了研发新型柴油机及改进现有柴油机，武柴决定进口一套交流电力测功机，由华丰贸易进出口公司代理。英国设备制造商是英国弗劳德·康鑫公司(Found - Consin Ltd.)，价格7万多美元。

吴琴心副总工向格里希汇报后，他多次提醒相关部门提前做好设备到货后的安装及使用场地的各种配套准备，细致到试验室的门窗设计，需要考虑控制柜的尺寸及运输吊装的通道保障。

1986年元月，设备运到武柴研究所试验室，湖北省商检局人员来现场参加开箱全过程，没想到问题多多，调试周期长达11个月之久。最后，在格里希的直接干预下，英国弗劳德公司才戏剧性的迅速同意免费更换一套全新设备。

4月，英方派人到武汉调试设备。4月17日，格里希到试验室查看调试进度，见到的是颇不顺利的场面。格里希告诉我们，这类成套设备销售的国际惯例，应该在购买合同里写明：买方派人到卖方工厂去培训数周。

在此期间，我们请华中工学院的老师来察看设备，他们从专业角度感到，这套设备不是专门供内燃机试验的专业设备，一部分是用来配用水力测功机的，而控制柜则是配用造纸厂设备的速度调节。他们还发现，该套设备并非全新。

事后各方披露的事实是，弗劳德公司把原用于造纸厂的二手设备拼凑起来发运给我们。弗劳德公司来了几波人到现场调试，其中一名英国专家从6月25日到7月11日调试无果，反将元器件烧坏。等待从英国寄来新电路板，但到8月3日仍然没有调试好，他也只好打道回府。

格里希有空就去调试现场，一次在看到控制柜内板有锈迹，他还用英语直接调



1986年9月21日，格里希从德国休假回厂第二天，召集三车间主任陶维顺（左一）、铸造车间主任詹玉荣（左二），研究发动机机体毛坯质量问题

侃英国专家：“这就是你们英国产品的品质呀！”

7月20日，格里希回德国休假。8月16日，弗劳德公司的香港代理维修公司捷安公司徐先生来武柴，继续调试和修理设备，三四天也不见成效。武柴准备进一步交涉。8月21日，我起草一份评价文件翻译成英文，发给了弗劳德公司和格里希。

9月18日，格里希休假回到武柴，专题听取研究所副所长邓思维和我的汇报，得知情况后气愤了。他琢磨了一会，就向弗劳德公司写了一份德文信函，让我拿到华丰公司发出。在信函中，格里希提到他将采取三个行动：“第一个行动，在武汉或其他某个城市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讲一下你们英国产品在我们武柴调试的状态，就该英国进口的电力测控机的品质问题进行通报。第二个行动，给英国驻华大使馆写一封正式的信函，就英国弗劳德公司产品进口到中国武汉柴油机厂的事宜进行交涉联系，通报情况。第三个行动，我将把武柴这里的情况，

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英国弗劳德公司出口到中国武汉柴油机厂的这个产品有品质问题。”

格里希列举的三项行动计划，我们在当年看来简直是惊天之举，也只有像格里希这样熟知西方商业惯例的人，才知晓这些举措的利害，效果也立马显现了。

11月20日，弗劳德公司的Wallance先生给格里希和武柴复函说：“格里希先生：您的邮件我们收到了。

我们公司将马上派两位高级管理人员到中国武汉柴油机厂来，与你们商谈对这套电力测功机合同的事宜处理。”同时，恳请格里希暂缓执行三项行动计划。

11月25日下午，弗劳德公司常务副总裁和负责亚太地区的负责人来到武柴，我准备了相关文件及该公司几位调试工程师的工作情况汇总，整理成英文版。实际的沟通过程很顺利，估计他们自知理亏，来中国之前已拟定解决方案：不增加任何费用，更换一套全新交流电力测功机。最后，双方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设备到货后，安装、调试、使用一切顺利。

回应美国记者的不实报道

1985年11月初，《纽约时报》刊登一篇美国记者的报道《格里希准备告退》，新闻媒体竞相传播，香港《明报》也用中文转发。报道大意是：格里希在武柴是有名无实的厂长；工作遇到重重阻力；再也无法待下去了，准备告退。

11月9日，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杨力宇教授收集相关报道，寄给武汉市外办主任丁华。

格里希在武柴，时常有外国记者来访。余维浩记得，10月下旬，一名美国记者专程采访格里希，并一起到车间巡查。格里希懂一些英语，双方便用英语交谈。余维浩也懂英语，但认为没有必要在他俩之间做翻译，还离开了采访现场避嫌。

格里希此前要求三车间对曲轴的轴颈面进行抛光处理，然而生产班组没有完全照章执行，现场检查后生气了。美国记者便把盛怒的格里希拉到一边，记下了他在气头上讲的一些话，并“添油加醋”一番。

11月26日，早例会后回到办公室，余维浩严肃地向格里希复述了美国记者的报道。

格里希勃然大怒，痛斥这位记者“胡来”。他说：“我当时说过有困难，但根本不是那样说的。世界上的不正派的记者总想别出心裁，以胡编乱造来吸引读者的眼球。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一直把自己做一个武汉人。这些宣传都是胡扯。我上次回德国休假，有50个新闻记者向我约稿，有的还约我写书，我都回绝了。我痛恨报界这种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宣传。请你转告王群书记、吴官正先生和丁华女士，我无意抹煞我们双方用心血换来的成果。”

“武汉市政府对您是不怀疑的。可是，问题已经发生，关键是怎么办？他们说您不想干了，是吗？”

“我从来没说过，这不是事实。”

“他们说您处处遇到刁难，这是事实吗？”

“这是捏造。”

“工人是否爱戴您，您心里最清楚。

然而，这个外国人偏说怎么怎么困难，这难道是事实么？这公正么？”

格里希愤然而起说：“我要写东西，我要在国际上辟谣。”

2月8日上午8时，格里希在武汉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新闻部两位记者的电话采访。两位记者用中文提问，余维浩翻译，格里希当场回答，主要内容包括：一年来武柴的变化，当前存在的困难，解决办法以及明年的计划。实际上，这是格里希向全世界宣告：有人说我要告退，可是今天，我还在规划明年在武柴的工作计划呢！

两天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报道，有关格里希的各种谣传，从此不攻自破。

1986年11月，格里希卸任。作为中国国有企业的第一位外籍厂长，他大力推行“岗位责任制”和“产品名牌制”，创建质量管理体系，撰写25万字的“治厂秘籍”。当年，武柴生产的柴油机开始向东南亚七国出口5000台，创汇逾100万美元。

1987年2月，我调到销售科管理柴油机的出口工作。给格里希当助手的经历十分难忘，我将在下文中回忆他的工作作风和对我人生经历的启迪。

李兵，格里希工作助理，后任法国迪特动力（武汉）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我为钢铁行业建言

◇ 牛琳霞

人物名片：牛琳霞，致公党员，曾任致公党武钢支部主委、青山区工委副主委；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武钢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第十二、十三届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常委；第十二、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曾任湖北省政府参事。

2011年3月，武钢党委统战部部长找我谈话，推荐我这个被长期留在党外的知识分子加入致公党，并让我接替致公党武钢支部主委岗位。经过两天深思熟虑，我欣然接受了部长的建议。6月份，正式加入以“致力为公、侨海报国”为建党宗旨的致公党。

因为我是以武钢集团基层民主党派主委的身份担任市政协委员的，所以这两届10年时间里，我利用政协和党派平台，立

足本职岗位建言献策，为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促进行业转型健康发展，保护传承钢铁文化遗产等发挥了一定作用，产生了良好效果。

墙内开花墙内墙外都该香

工业倍增是武汉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2年6月，市政协常委会围绕工业倍增计划实施主题开展协商，唐良智市长出席会议。武钢系武汉实现工业倍增的重要支撑，致公党市委会推荐我参加大会发言，我作了《充分发挥武钢产业优势，助推武汉市工业倍增计划实施》发言。其中关于“政府搭台支持武钢钢材省内市内使用，继续给予大客户相关优惠政策”的建议得到市政



参加市长与政协委员对话会

府高度重视并很快落实。8月，市政府出台文件明确规定：将钢材采购相关政策延续到2014年。

然而，调研发现：政府的钢材优惠政策存在兑现时间不及时、金额不足额问题。2013年1月两会前夕，在市政协举办的提案咨询会上，我向市财政局反映和质询此事，局长表示：一定按文件精神办理好。大会期间，我提交了《关于更好落实市政府支持武钢钢材优惠政策建议》提案。6月，市财政局回复：将拿出500万元预算内资金用于支持武钢。当年9月，补贴政策落实到位，武钢本地区部分大客户得以稳定。

“十二五”以来，武汉加快国家中心城市步伐，建筑工地遍布三镇。2013年初，国家有关部委出台《关于加快应用高强钢筋的指导意见》，武汉市率先启动推广500兆帕级高强钢筋。

我组织党派成员先后到青山众圆广场、八大家红坊里、万科金珠南湾等地考察建筑用钢采购、剪切加工及使用情况，随后与市经信局组织的专家同赴重庆市进行实地考察，学习重庆工厂化加工配送中心建

设、高强钢筋推广使用经验。

8月7日，我有幸参加市长与政协委员对话会，作了《关于武汉市建筑行业试行高强钢筋工厂化加工配送建议》发言。唐良智市长很是赞同从设计和生产源头引导高强钢筋应用、确定试点企业和示范工程、逐步壮大我市建筑钢筋加工配送服务产业的几点建议。唐市长当即指示在市重点工程强制推行，并安排市城建局落实。

良好开端给予我乘胜追击的勇气和信心。2014年1月，在市政协大会期间，我提交《关于加快推进我市建筑行业高强钢筋工厂化加工配送的建议》。7月，在致公党市委的协调下，市政协组织三方协商会议，我作为提案人，与市城建局、经信局以及近10家钢筋加工配送企业共同召开提案推进会，使提案建议得到有效落实。这一优化供给侧产品结构、确保建筑工程质量、提高钢材利用率、降低生产安全隐患的现代建筑方式，开始在武汉施行。

确保国有大型企业周边环境安全稳定

武钢生产厂区周边环境整治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问题。据调查，厂区周边3公里内竟有170多家废品收购站，主要收购被盗的武钢生产物资。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企业安全生产。

2015年2月初，我有幸参加与市委书记对话会，作了《优化法制环境，促进武钢

厂区周边安全稳定》发言，提出划定红线并严禁禁区设立废品收购站、工商及城管部门加强监管、公安部门开展联动整治、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劳动机会等建议。

阮成发书记充分肯定了我的建议。会后青山区、洪山区综治办打响了武钢周边整治攻坚战，经过半年定期排查和疏导，武钢周边非法入厂偷盗原材料、切割能源管网等行为大幅减少，大量无证废品收购站被取缔，武钢安全生产环境明显改善。

2018年1月，在武汉市政协大会联组会议上，我作了《关于三环线友谊大道至武钢厂区大门路段的交通堵塞问题》发言。会后，洪山区交管局、城管局到现场管理整治交通堵塞、路边餐馆出店经营等问题。

由于该路段的问题反弹十分严重，7月初，我再次向市公安交管局反映此事，并陪同市公安交管局及洪山交通大队负责同志现场实地查勘，研究解决措施。此后，洪山交通大队坚持早高峰时段交通疏导，加强餐饮门店管理，划定路边临时停车位，拆除部分中心路段护栏等。至2019年，该路段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2015年2月，牛琳霞参加市委书记与政协委员对话会

2019年3月，我向武汉市民政局提交《关于武钢厂区4号门和10号门前道路命名与管理的建议》。市民政局非常重视，安排会同青山区民政局协调处理此事。我们两次实地考察，确认了道路的长宽度、周边环境、与其他道路相连情况等相关信息，并向当地居民及有关人士征集道路拟定名称，最后报市民政局。

6月26日，市民政局批准并下发《关于青山区部分道路标准命名的通告》，其中，4号门路段命名为铁铺岭路、10号门路段命名为金家嘴路。随后，市城管局、交管局按程序启动两条道路的路牌、路灯及红绿信号灯设置等相关工作。年底，两条道路纳入武汉市交管系统。

武汉钢铁工业文化应该被记住

2015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二天，致公党市委会常务副主委张河莹给我打电话，说市政协领导团拜时要求致公党承接年内首场界别协商会，她希望武钢支部完成这项任务。鉴于武汉正在推动“文化五城”建设，

我和张主委商议后确定主题为：挖掘和利用钢铁工业文化遗产。

武钢支部随即成立了项目组，深入汉江边，寻找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时种下的“铁厂界碑”；来到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建设工地，了解新馆建设资金困难及周边配套工程问题；实地考察前苏联援建武钢时建设的连片红色小

楼，见证红钢城“红房子”昔日的风韵和今天的沧桑；在武钢自建的中国第一家钢铁博物馆内，领略冶金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神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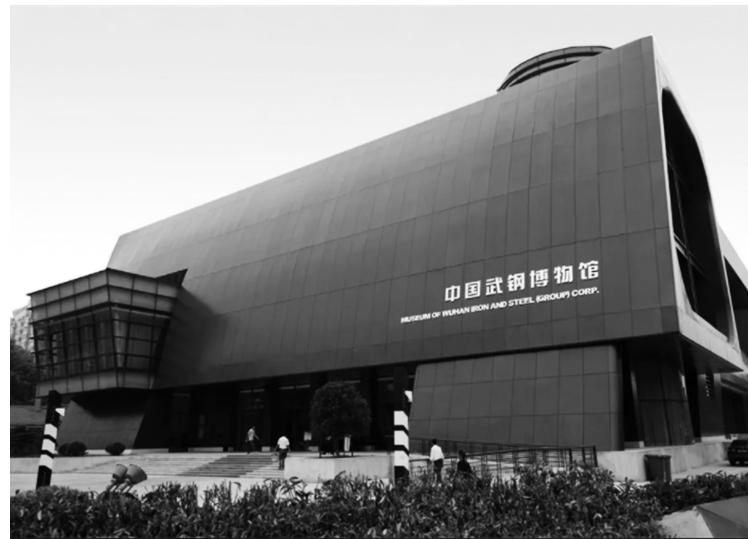
调研认为，武汉市钢铁工业文化遗产现状令人担忧：一是绝大部分遗产残缺不全，百年老厂仅留下少许印记；二是对钢铁文化遗产价值认识不足，保护利用处于起步阶段；三是城市建设重经济开发，轻遗产保护利用；四是保护资金投入有限，馆藏遗存生存艰难。

6月29日，武钢支部与市规划局、财政局、文化局及汉阳区、青山区政府等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面对面协商，刘英姿副市长出席。项目组分别做了挖掘和利用武汉市钢铁工业文化遗产、“汉阳造”工业文化遗产、张之洞博物馆文化遗产、青山“红房子”文化、武钢博物馆文化传播等5份报告。

市政府有关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方协调张之洞博物馆新馆事宜，并就项目建设、周边地块土地置换等达成初步意见，解决了新馆建设中的部分“肠梗阻”问题。市文化局领导也当即承诺，对武钢博物馆承担社会责任、履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义务给予政策倾斜。

年底，武钢博物馆得到市文化局80万元补贴，得到青山区政府20万元补贴。这些经费为武钢博物馆正常运营及创新服务提供了经济保障。

从2013年起我担任了两届省人大代表，2017年起我担任省政府参事。任职期间，我的部分建议和调研报告得到省领导及省厅部门的重视。如：《关于推进湖北省绿色



武钢博物馆外景

建筑产业化发展的建议》被确定为省人大重点建议，主管副省长亲自督办；《关于更好发挥“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时代特色的建议》，由省人大、省文旅厅督办整改，促进提档升级；《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湖北钢铁绿色发展的建议》在湖北卫视专栏播出。《关于我省民营钢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提高湖北磷石膏产业综合利用率的建议》《关于提高湖北省铁矿资源低碳绿色开发及综合利用的建议》等参事建议得到省领导批示。

我成长于武钢，武钢的发展史展现了近现代中国钢铁工业的澎湃之路，承载着新中国工业化梦想。我时刻牢记企业的嘱托和期望，结合钢铁行业的实际建诤言，实现本职工作与建言献策互动，获得企业发展与个人价值的双赢，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武汉实践做出应有贡献！

金桥越天堑 通途润民心

——武穴长江公路大桥建设纪实

◇ 张建军

这是一个值得武穴人民永远铭记的时刻。2021年9月25日零时，一座双塔单侧混合梁斜拉桥横跨武穴、阳新两岸，武穴长江公路大桥正式开通试运营。武穴人民千百年来“天堑变通途”的夙愿得以圆梦成真，建设者们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新时代的奋进之歌。

精心谋划绘鸿图

上世纪90年代，吴荷花从阳新嫁到对岸的武穴。每次回娘家，她要先坐10公里的公交到渡口，然后坐船晃悠近一小时到对

岸的富池镇转车。遇到大风大雨大雾，轮渡还停航。10多年前，她父亲突发急病，她和丈夫辗转三个小时才过江，到家时父亲已去世。

隔山容易隔水难。素有“鄂东门户”之称的武穴，与对岸湖北阳新、江西瑞昌的人流、物流来往密切，但长江天堑让两岸群众往来不便。建一座长江大桥，是广大百姓翘首期待的梦想。

回顾武穴长江公路大桥谋划历程，可以用“从无到有”四个字来概括。在人民群众的期盼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早在2001年，长江大桥建设就纳入武穴市



建设施工中的武穴长江公路大桥

“十一五”发展规划。2004年7月，武穴长江大桥被国家规划为70条长江过江通道之一，但这只是远景规划，未能落到实处。2008年12月，湖北省政府发布《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交通规划纲要》，要求将鄂东公路网加设一条一级公路加密线，用于解决大别山老区经济发展问题。

听到这一消息后，黄冈市和武穴市交通局领导脑海里共同闪出“长江大桥”这一设想。在武穴市“四大家”联席会议上，市委书记张社教说：“申报大桥项目是我们的职责，如果申报没有成功，我们终生无憾；如果没有努力申报，可能就会遗憾终生！”

2010年，武穴市政府委托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开始对大桥项目进行资料收集、踏勘和规划设计工作。

2011年8月，湖北省政府发布《湖北省公路水路交通“十二五”规划》，将麻阳高速公路定为湖北省规划的“七纵五横三环”高速公路路网中的“纵一线”。麻阳高

速公路北起麻城，南连阳新，将沪蓉、武英、沪渝、杭瑞四条东西向高速公路连线成网，是济广高速和大广高速之间的纵向加密线。武穴长江公路大桥项目实施后，将在长江鄂东、赣北新增一条过江通道，打通鄂赣皖豫四省毗邻地区的省际南北向快速通道。

武穴长江公路大桥项目位于两省（湖北、江西）三地（黄冈、

黄石、九江）毗邻地带，大桥北岸是湖北省武穴市。大桥起点位于武穴市四望镇西南约2公里的新屋岭附近，在武山湖西过黄泥湖，穿仙姑山，经上洲跨长江至上巢湖，在湖北阳新丰山铜矿与江西瑞昌邓家山之间通过，终点位于阳新县枫林镇塘湾村附近，在此连接杭瑞高速公路。

武穴长江公路大桥总投资约58.86亿元，项目总里程31公里，其中主体大桥全长2007米，主桥斜拉桥长1403米，山岭隧道4座，全长6.608公里。武穴互通至富池互通段（含长江大桥）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线设计车速100公里/小时。

2015年6月2日，国家发改委以发改基础〔2015〕1214号文件，对武穴长江公路大桥项目予以核准批复，标志着武穴长江公路大桥获得“准生证”。2015年6月19日，湖北武穴大桥有限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一次工作推进会，标志着武穴长江公路大桥项目建设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精确申报攻难关

武穴长江公路大桥申报工作历经艰辛。跨江大桥由国家审批，立项前期手续繁多。首先是工程踏勘调查，然后是专题研究，最后是层层审批。

专题研究共包括项目环评、水土保持、过江通道河势分析、河床原型观测、水文分析、数学模型计算等 19 项。武穴市根据省交投公司和相关专家要求，对郭祥、余祥、半壁山三个桥位进行比选，取得了两省三地的全部相关部门批文。仅仅用时两个月，就办理了交通运输部通航安全论证报告相关报批支撑材料，取得黄石阳新的码头拆迁承诺，获得江西省瑞昌市码头港口规划，签订了江洲船厂相关安全协议。

实话实说，从武穴现阶段的经济分析、交通流量测算和大桥效益预测来看，武穴市建桥条件都不是非常理想，因为这是一个“贫民桥、老区桥”。既没有国家领导人批示，也没有国家专项政策倾斜，但武穴市委、市政府申报的态度认真、诚恳、坚决，省交投公司、专题研究单位和设计单位都深受触动。

为了完善可行性报告，武穴市领导先后九次到江西瑞昌和黄石阳新进行沟通联络，无数次到省交通运输厅、省发改委、省交投公司汇报。通过协调，湖北省分别以鄂发改交通〔2013〕592 号和鄂发改交通〔2014〕349 号文件，向国家发改部门进行项目申报（省交投公司为了争取国家资金，第一次以审批制申报，第二次才使用核准制申报）。

大桥前期申报工作，面临桥位选址、阳新接线主体确定、投资模式选择、项目配

地抉择等诸多困难。在困难面前，工作专班的同志们感觉最难的不是奔波劳累，而是协调沟通，是时间流逝和岁月蹉跎中壮志未酬的遗憾与委屈。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从 2010 年至 2016 年的五年多时间里，武穴市与两省三地三县几百家单位打过交道：有跨省的行业部门，有独立管理体制的部队，有程序化按部就班操作的政府机构，还有自负盈亏的企业单位，专班无不一一登门对接。申报专题报告印刷上百本，盖章 500 多个，开会数百次，进京 30 余回，迎来送往专家一批又一批，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2016 年 9 月 26 日，交通运输部以交公路函〔2016〕606 号文对该项目初步设计予以批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批文出笼，令人欢欣鼓舞，终于看到“一桥飞架南北”的希望和曙光。

精准服务保安澜

春江水暖生豪气，创业艰难百战多。2011 年 3 月，武穴市委、市政府成立武穴长江大桥及麻阳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市委书记任指挥部政委，市长任指挥长。沿线镇（办事处）党委、政府和村组及时组建专门机构。

市委书记郝胜勇、市长李新桥经常深入施工现场了解情况，多次召开大桥建设协调会，解决大桥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广大党员干部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工作作风，全力推进长江大桥建设。

大桥服务民生，百姓情系大桥。作为一项直接惠及人民的德政工程，大桥的建设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沿线干部群众以舍小家顾大局的付出

和奉献，构筑成武穴长江公路大桥的精神高原。

2016年1月24日召开武穴长江公路大桥征地拆迁动员会，至2017年7月中旬，大桥沿线已拆迁房屋194间，征收红线内土地1350亩，征用临时用地170亩，迁移坟墓1504座，砍伐迁移各类树木63809棵……

这些基础性工作为大桥工程的落地提供了建设平台。2016年9月底，武穴长江公路大桥开工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2016年12月1日起，大桥全线31公里的施工区域被不同工区分割包围，大桥建设全面铺开。

作为大桥建设的主力军，湖北交投公司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铸铁军，扛牢责任勇担当。公司党委与黄冈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开展“规范权力运行、打造阳光工程”专项活动，共同制定《廉洁风险防控手册》，筑起牢固廉政防火墙。

党建就是战斗力。王宇云，曾任武穴大桥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负责武穴长江大桥、棋盘洲长江大桥两个项目的建设质量和安全。两座在建大桥相距40多公里，建设初期质量监管任务重，他每天都要奔波于武穴、黄石两地，忙碌的时候甚至来不及好好吃上一顿饭。

2017年9月27日下午，王宇云刚从武穴忙完赶回黄石棋盘洲驻地，就倒在办公室再也没有醒来。“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王宇云用奉献和忠诚，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

功成不必在我，成功必定有我。长江航道局蕲州航道处为武穴大桥建设施工保驾护航，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要在大桥建设期间，尽我所能，为服务大桥施工做实事。”武穴桥维护站点成立之初，船长张汉江第一个提出申请。“我



武穴长江公路大桥主桥面合龙仪式

家是外地的，到武穴大桥维护站点算我一个。”大副王海军紧跟其上。“我家是武穴的，这地方我比较熟，大家工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也能帮上忙，我到武穴大桥维护站点比较合适。”轮机长刘宽不遑多让。2017年9月13日起，一艘航道趸船、一艘航标艇矗立在武穴大桥下游，十多名职工坚守岗位，服务大桥施工建设，这一守就是四年。

2020年2月20日19时左右，驻守武穴桥维护站点的胡锦桢值班时，突然发现岸上燃起火光，迅速叫起了其他同事。船长王海军立即组织职工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并携带灭火器，铁锹等消防装备赶赴现场救火。火灾地点位于武穴大桥下游400米大堤上，大堤两侧建有大桥建设单位库房和商店，并且航道部门仓库和电缆设施也都在大堤上。王海军带领航道职工到达火灾现场时，已有部分村民正在试图扑灭火灾，然而江边风大，火借风势，缺乏消防经验及消防器材的村民们难以遏制火势。

王海军迅速带头手持灭火器冲到火线，轮机长刘宽则疏散村民。在大家的密切配合战斗下，火势很快得到了控制。为了确保不会复燃，他们又用消防桶打水浇灭残余火星，并用铁锹铲来沙土进行覆盖。航道职工们以大无畏的精神迅速扑灭火灾，赢得了附近村民和大桥施工人员的赞许。

精细施工创优质

匆匆岁月，见证千秋大业。为确保大桥贯通及麻阳高速公路全线通车，投资建设方、施工方、协调方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建设一座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百年大桥、放心大桥！”这是大桥决策者和建设者的共同理念。

因受地形限制，武穴长江公路大桥为湖北最高的不对称斜拉桥。作为跨度千米级的斜拉桥，桥型、塔高、结构的“三不对称”，给建桥带来很大困难。

大桥南岸主塔共浇筑混凝土2万立方米，相当于灌满8个奥运会标准泳池；消耗钢筋3500吨，重量相当于近2400台小轿车；历时18个月爬升233.6米，相当于80层楼高。

南主塔位于江岸山坡上，施工场地狭小，其中主塔承台约一半建在坡度近45度的山体上，山体岩层破碎，施工难度极大。为此，项目部克服地势陡峭、强风化层岩体打桩、大体积混凝土浇筑、高塔线形变化等一系列难题，使用了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确保塔柱混凝土“内外兼美”。

位于武穴方向的北塔高267.42米，施工难度更大。主塔钻孔桩直径达3米，有38根，钻孔深度达110米。由于地下岩层结构复杂，软硬不一，钻机下钻就像“筷子插在沙琪玛上”，极易偏斜。为此，项目部及时调整工艺和设备，用回旋钻机组合旋挖钻机，保证钻孔的垂直度在100多米，地下偏差不超过1%。

北塔施工亮点频显。项目部自创“哑铃”型围堰，犹如两个肥皂泡贴合在一起，保持最优受力结构，还自带钻孔平台。巨大的钢围堰采用这个新工艺，自重从4700吨降至3200吨，不仅节省1000多万元的材料，还提高了作业效率和施工质量。

大桥两岸共有4条隧道：武穴岸2座隧道较小，阳新岸（与江西瑞昌交界）的丰山隧道、背架山隧道为长大型隧道，其中背架山隧道最长，左幅2894米、右幅2920米。两座隧道所在地属于构造溶蚀低山地貌，有30多个溶洞，积水最深近8米，施工难



武穴长江大桥雄姿

度极大。项目部采取护拱吹砂、反坡排水等工艺工法，克服重重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

为提高大桥护栏安全性，武穴大桥公司对即将安装在武穴长江公路大桥上的防护栏进行小汽车、大客车、整体式货车和鞍式货车撞击试验。这是国内大桥首次进行八（HA）级梁柱式型钢护栏撞击试验，防护等级世界最高。

2020年12月25日，武穴大桥通过交工验收。经过四年多奋战，一座双塔单侧混合梁斜拉桥横跨武穴、阳新两岸。让武穴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汪西华印象深刻的是，通车那天凌晨，周边村民自发敲锣打鼓庆贺，等候在收费站入口处，非要“尝鲜”抢先上去看桥。5分钟过桥、20分钟到家！这样的速度让两岸村民恍如隔世。真可谓是：金桥越天堑，通途润民心。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麻阳高速公路及武穴长江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为武

穴及周边市县高质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为两岸人民经济生活和交往互通带来了质的飞跃。

当前，武穴人民正借大桥贯通之势，举科学发展之旗，沿着“冲刺全国百强，打造千亿园区，建设现代港城”的目标方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武穴新篇章！

张建军，武穴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缩影”

◇ 邱 玲（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邱玲，市政协委员，民盟市委常委，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

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缩影。”这句话在我近四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一直萦绕于心，成为我对表演最深刻的体悟。从16岁进入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原武汉话剧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到现在已有四十余年，我的每一步成长都不开自己对表演的热爱与执着，也离不开身边良师益友的支持与引领。他们是我的领导、导师、朋友、同行，是他们为我照亮了艺术道路上的每一段旅程，也让我的人生更加充盈而丰盛。

抓住每一个不起眼的机会

我们单位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并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国有文艺院团，其前身是冀察热军区十三团宣传队，1949年随军南下武汉，成立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后更名为武汉人民艺术剧院。这段特殊的历史经历，让剧院有着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一直都秉承着为党服务的艺术精神。在剧院的历史长河中，涌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品和艺术家，如上世纪50年代电影《青春之歌》的导演崔嵬就是我院的第一任院长，主演谢芳也是我院的第一代老艺术家，她饰演的林道静一角成为荧幕经典，激励了无数青年投身祖国建设。

从1950年代开始，剧院每10年招一次新生，1984年我有幸成为剧院学员班的一员。当时的我年仅16岁，在武汉六中读初中，因为热爱舞蹈，在学校是文艺积极分子，怀揣对舞台的热爱，参加了剧院来学校的招生选拔。初试时，我用稚嫩的普通话背诵高尔基的《海燕》、演唱《三月里的小雨》。尽管歌声不算出色，表演也稍显青涩，但我表现出的勇气和热情打动了评审老师——特别是我的恩师张永林老师。在他的坚持下，我得以进入剧院，开启了一段充满挑战与收获的艺术之旅。

当时班上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地域和年龄跨度都很大，我是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剧院对我们这批学员很是重视，专门从上海戏剧学院请老师来给我们上专业课，让我们受到非常专业和严格的训练。每当院里有常规演出，我们也会跟着一起登台，比学校里多了许多实践锻炼的机会。回想起那段学习的日子，真是幸福和温暖。

这条路也不是一帆风顺。刚进剧院时，我因为嗓音不好，也可能是年龄太小，没有掌握良好的发声方法，台词老是破音，不得不转去化妆组学习舞台化妆。虽说转到了幕后，但内心深处对表演的渴望从未消退。恰逢当时剧院有个老师很新潮，创作了许多小品节目，缺一个主持人把这些小品串起来，我意外地被选为小品晚会的串场人。

我十分珍惜这个能够站上舞台的机会，在下面仔细揣摩，认真准备，学习借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风格和方法，完成了从“报幕员”到“主持人”风格的转变，受到剧院领导和老师们的肯定和表扬。得益于他们的支持，我成功返回了演员的身份。

回望那段日子，深深体会到：上天不会凭空把机会给那些没有准备的人，每一个

看似不起眼的机会都可能是命运的转折点，充分把它做好，人生之路就会宽广得多。

用心演戏，提升永无止境

90年代，我参与了一些影视剧的拍摄，最难忘的一次拍摄经历是巴特尔导演的电视剧《车间主任》，剧中一位话剧出身的演员深深影响了我。他饰演的是一个有着改革新思想的厂长，编剧给厂长写了大段大段的台词，要在全厂大会上讲出来。这么一大段的台词，其实演员完全没有必要全部背下来，可以通过不同镜头的切换来完成。但这个演员直接一口气把这场戏演完了，导演本来准备了N个镜头，最后全部不用，变成了一镜到底。

这位演员在片场专注、沉静的态度和一气呵成的精彩表演，令所有人折服。那一刻我真正地意识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有在台下默默用功，才能在台上绽放光彩；在学校里仅仅完成了对这门专业的初步认识和了解，而对专业的提升一定是在永远在路上。从那以后，无论话剧还是影视剧，我都以这种信念严格要求自己。

《人生一台戏》这部话剧让我有了第一个正式角色。剧中，三个身份各异的老头在一个病房里相聚，每人都有一条线来介绍他的家庭经历和对人生的态度。其中一个老头有个小老婆，是剧里的一个色彩人物，具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剧院请了一位知名话剧演员来饰演，把我安排做她的B角。尽管起初只是B角，但我认真地跟全程排练，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看A角老师怎么怎么演、怎么处理表演细节。

但人生如戏，总是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节，A角老师意外受伤，我临危受命，

在同台老师的帮助下成功接替她完成了演出。这次机会不仅让我赢得剧院领导和老师的认可，也得到了观众掌声，更坚定了我在演艺道路上坚持下去的决心。即便是配角，也要全力以赴；即便是替补，也要做好万全准备。

特别还想说的是武汉电视台的汉味栏目剧《都市茶座》，这是夏雨田、何祚欢、田克兢等武汉本土艺术家们在2000年创办的方言节目，由于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喜爱，从二十多年前开播到现在仍在播出，这是个奇迹。我十分荣幸参与其中，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地守护着“他”，与团队的老师们一起风风雨雨共事二十余年，我们是彼此艺术道路上的知己和家人。

突破自我，探索更多可能

2011年，我在台下观看了音乐剧《妈妈咪呀》，当时就被其绚丽的舞台效果与全新的艺术形式深深震撼。后来知道，这是中演集团引进的中国第一部百老汇音乐剧，引进的是一级版权，演员是中国人，但导演、音乐总监、形体总监都是英国的原创团队，由他们来中国打造全华班演员阵容的中文版。

次年，在朋友鼓励下我去参加该剧第二季的选角。虽然心中很忐忑，但我还是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大胆地向剧方递出简历，踏上前往上海的飞机，参加了面试，没



邱玲（前排左三）参演《妈妈咪呀》中文版

想到最终成功入选。担任“罗西”这个角色是我表演生涯最大的挑战，也让我发现人的潜能其实是无限的。

跨界演音乐剧，演唱极其重要，在这里我们几位演员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声乐，我也第一次接受系统的声乐训练。之前觉得自己高音老是唱不上去，现在发现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发声方法，顺其自然就会上去。

在此后两年的巡演中，我参与全国30多个城市500余场演出。行程虽然很紧，但音乐和舞台带给我的享受是巨大的，开始真正地去享受和驾驭舞台，每一次登台都让我更加自信从容。《妈妈咪呀》不仅是我艺术生涯的新篇章，也让我深刻感受到舞台的力量。

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因为对音乐剧的热爱聚集在一起，互相学习、帮助，同组伙伴们对梦想的坚持、对他人的帮助，都让我感觉非常温暖。与此同时，这个戏的巡演还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音乐剧人才和观众，对我国音乐剧的发展有着非凡的意义。

用戏剧的光温暖更多人

2016年9月，我受邀担任武汉大学艺术学院表演专业的外聘教师，从15级到19级，完整地带了两届学生，积累了8年宝贵的教学经验。表演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不能仅在理论上下功夫，还需要将表演理论知识和舞台实践相结合。用我的表演经验来指导这群缺少舞台实践的孩子们，培养一批和我一样热爱舞台的年轻人，是我一直都想做的事情。

任教期间，我指导学生排演的话剧《我在天堂等你》（15级）、《同船过渡》（19级）分别在两届武汉大学生戏剧节中荣获金奖。毕业大戏《喀秋莎的旋律》（15级）、《罗密欧与祝英台》（19级），获得学校师生们的好评。教学相长，在教学过程中我也更进一步深化了对表演艺术的理解。

在剧院学习工作了40年，对剧院有着深厚的感情，只要剧院工作需要，干什么都是开心的。感谢领导信任，让我从2023年开始担任剧院副总经理的职务。在为剧院的艺术创作和演出做好服务的同时，我也努力在为青年人才的成长提供帮助，就像当年老师们帮助我一样。

2012年我就当选为市政协委员，到现在已经是连任三届的老委员了。作为政协委员，一直在思考如何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去履行委员职责，特别是想着如何在戏剧方面做些建言工作，去推动戏剧教育的发展。

戏剧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这些形式包括：诗、乐、舞。诗指文学，乐指音乐伴奏，舞指表演。戏剧能让



参加武汉电视台《政协论坛》“两会特别报道”

人宣泄情感、陶冶情操。戏剧艺术对孩子们的熏陶是沉浸式的，这是其他艺术无法比拟的，它对孩子们的团队合作，语言表达，想象力、创造力、表现力等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为此剧院专门创排了红色题材儿童剧《听来的故事·闪闪的红星》。在观看该剧的过程中，小朋友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潘冬子的故事，从而在心中播下红色种子；还能通过剧情中个性不同的孩子们凝聚一心的行动了解到团结的力量，收获个性上的成长。这正是“红星照我前行”的最佳写照。

这些年来，我的提案一直都是围绕着如何推动红色戏剧作品进校园，让孩子在戏剧活动中感受人生的酸甜苦辣，获得能量，健康成长。在众多同道者的共同呼吁推动下，现在戏剧教育已经正式纳入美育的范畴。戏剧曾点亮我的人生，现在的我希望能用它去点亮更多孩子的童年，去温暖更多人的人生。

红旅线上政协情

◇ 余红华

人物名片：余红华，新洲区政协委员，区园林和林业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新洲区东北部地处大别山南麓，系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武汉的天然生态屏障。这里坐拥武汉最高峰将军山，蜿蜒盘旋的穿山公路犹如一条长长的巨龙，在云雾中腾跃，一帧一画记录下岁月风华。这条串联百里画廊的公路，便是全区着力打造的红色旅游线。十二年前，当我成为一名政协人时，就与这座山、这条路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情牵将军山

我是土生土长的新洲人，熟稔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对将军山的记忆可以

追溯到幼时。那时候，经常到“东半边”的山区走亲戚，晚上住宿在亲戚家时，最开心的就是听长辈唠嗑、讲故事。将军山的故事很多，如“金鸡”与“将星”的故事，红六军团十七师在七家田消灭国民党军的故事，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随着年岁渐长，对将军山才有了具象化的了解，中途也跟朋友去过几趟。那时的将军山，人迹罕至，虽风景秀美，但过于杂乱随意，仅有几条羊肠小道穿梭山中。交通的不便，让这座山与其秀丽的风景一同沉寂。

与将军山真正结缘是到新洲区政协机关工作之后。2012年4月，我从李集街道调到区政协机关工作，担任社会法制与人口资源环境委副主任，2015年任提案委主任。政协是智力密集、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地

方，党委政府十分重视，经常问计于政协。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只要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紧扣党委政府工作重心、关注和贴近民生，调研有据，建议有理，助推有度，是很容易出成果的。将军山的蝶变、红色旅游线的繁华，就是印证。

本世纪初，区委、区政府根据新洲的资源禀赋实际，提出建设“三区一明珠”的发展定位。随着道观河风景区的开发，充分挖掘将军山革命老区红色文化、道观河报恩禅寺佛教文化、问津书院儒家文化，打造文化旅游新区，将新洲建成武汉的后花园、东部生态屏障。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二十多年来便成了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追逐的梦想。

2009年12月25日，区政协三届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快我区东北部生态文化旅游建设的建议案》，“按照‘加快生态文化旅游发展，基础设施先行’的思路，加快东北部道路建设”“着力打造道观河、将军山、少潭河、孔子河、问津书院等景区景点”等一系列意见建议被区委、区政府采纳，广大政协委员围绕红色旅游线的开发、打造、提升等，通过各个平台积极发声、呼吁、献计献策，将军山、红色旅游线真正进入新洲人民的视野。



将军山将军洞纪念碑

作为政协的一份子，至此我也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

打造红色旅游线

我在政协工作期间，正是新洲区经济腾飞、各行各业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将军山资源开发、红旅线打造的关键阶段。从社法委到提案委，我先后参与建设武汉东部生态新城、打造东北部生态文化带、凤凰镇建制镇探索等专题调研，并执笔调研报告。

2013年12月30日，由我执笔的《关于实施“绿满新洲”行动计划、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的建议案》在新洲区政协四届四次全会上通过。2014年，区政府通过《“绿满新洲”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年）》并分解责任细化落实。

此后，在区政协主席王建生、分管副主席王泽元的带领下，我负责建议案的常委会会议协商组织工作，并与区政府督查室联手跟踪督办。通过两年来区林业局的努力，圆满完成建议案办理。新洲东北部山区的森林质量因此得到了显著提升，森林覆盖率明显提高，形成了四季有景的特色，为打造东北部红色旅游线创造了条件。

从2014年开始，我与其他委员一道，持续为红色旅游线打造发力。我们先后累计提交“利用现有旅游资源、加强旅游文化建设”“加快东北部山区生态旅游建设”“念好道观河山水经，建设东部养生休闲福地”“整合资源优势，擦亮东北部生态旅游名片”等各类建言53篇；提交关于修复问津书院、开通红色旅游线路、整合新洲东部山区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新洲东北部生态文化旅游圈、生态修复红旅二期沿线山体等集体和个人提案37件。



新洲区政协主席高潮率政协委员视察红色旅游线

我的履职足迹遍布新洲的角角落落，覆盖红色旅游线景点挖掘、交通通畅、景观打造、产业发展等事关东北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擦亮新洲生态名片

2017年8月，我调任辛冲街党工委副书记、政协联络委主任。2020年4月，又调任区园林和林业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并继续留任区政协委员。

一到现职，我就负责区政协五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打造红色旅游线路绿化景观示范带的建议案》办理工作。这是一个纳入政府投资计划的项目，计划总投资4500万元，分两期建设，由区园林和林业局负责具体实施。这项工作高度契合我的政协情和红旅梦，让我异常兴奋。

红色旅游线绿化景观带项目寄托着政协人的厚意，承载着东部山区人民的希冀。对于这个大型投资项目，局党组高度重视，高起点规划，将景观建设与生态环境优化、

历史文化挖掘及村庄发展结合起来，采用“一带多结点”模式，围绕路、立足林、突出绿、打造景、拓展彩，通过造林、保护、复绿和景观建设改造相结合，达到远处看绿，近处看彩，路边看花的景观效果。

一期项目规划设计时由于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只能通过线上视频，先后召开4次专家论证会。我到园林局工作后参加了最后一次论证。

红色旅游线绿化景观带项目建设过程中得到了沿线的旧街街、道观河风景旅游区管理处、徐古街的大力支持，两街一处都设有专班，明确专人负责协调推进。我们克服了施工线路长、缺水少电、环境艰苦和疫情影响等不利因素，项目建设指挥部是每周一次调度会，局园林科每天至少有3名技术人员“钉”在一线。我虽然分管工作很多，但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红线上，这缘于强烈的事业心，更缘于深深的政协情结。

红色旅游线绿化景观带项目一期工程起于辛冲街冯畈村，止于徐古街长岗山村，全长35公里，主要策划内容为山体骑行、山地跑，着重完善基础功能，2020年9月动工，当年12月竣工，投资1412万元。二期工程以徐古街长岗山村为起点、雷桃树村为终点，全长14公里，主要策划内容为打造红色文化景观，2022年1月动工，当年11月竣工，投资1636万元。二期的规划经过了反复修改，最后按照区长刘润长提出的“山相、水相、林相、田相、庭相”进行了一个整体规划设计。



新洲红色旅游公路

一、二期工程建设总面积 46.77 万平方米，栽植乔灌木 2.8 万余株，藤本植物 2 万余株，地被 5.2 万平方米，边坡治理 2.8 万平方米，另建有观景亭、栈道、雕塑、停车位等设施。建设完成后，红色旅游线的文旅休闲功能得到了极大提升，实实在在成为老区人民的致富路，擦亮了新洲的生态名片。

区政协对红色旅游线绿化景观带的建设自始至终给予了高度关注。易金莲担任主席期间先后召开常委会专题协商会、一线协商座谈会，区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参加并回应。高潮担任主席后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和提案办理回头看座谈会，形成协商成果 15 篇。因为到将军山主峰的山体尚未完成修复，后续 6.5 公里景观带需要续建，2023 年，区政协又将红色旅游线绿化景观带（三期）建设列为重点提案予以推动。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将军山及红色旅游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里风光旖旎、景点串珠，引得游人如织、流连忘返，是全国性山地马拉松比赛的首选地，是自驾游打卡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产业兴旺、村民富足，旧街茶、徐古菌蜚声全国，承载着新洲二次创业和腾飞的希望。

二十载光阴如流水，延伸着一代代政协人的梦想，新洲区以红色旅游为依托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成功之际，就是新洲政协人圆梦之时。如今我常会与好友、家人一道，沿着这条“最美公路”穿越如诗如画的山水，探寻先辈们的足迹，追忆往昔岁月。也时常会因为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因为自己参与并见证了这座山的蝶变、这条路的升华而自豪骄傲。

智能天窗，透入我人生的光

◇ 孙汉超

人物名片：孙汉超，山东省乐陵市人，优靓重工（武汉）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夏区政协委员，江夏区郑店街道商会副会长。

如果说人生有分水岭，我的分水岭应该在2011年。

由于800元学费我辍学离开山东老家，在天津建筑工地当小工时不慎坠楼落下残疾，于是南下江苏历经职场挫折四处漂泊……2011年以前，我的人生只能用“晦暗”二字形容，苦得不像一个“80后”。直到2011年来到武汉，有幸在智能天窗领域找到方向，让我晦暗的人生迎来了光亮。

800元学费挡住了我的求学路

2002年正月初八，迎来高二的下学期，一大早我穿着父母买的新衣服，带着新学期

的期望和学费，步行半小时终于挤上了通往学校的8路汽车。

公交车上非常挤，人贴着人站立，进入县城车上开始躁动，我被挤到了车门口，一大波人下车。车上人少了，双手终于有了自由活动的空间，我一只手抓着扶杆，一只手整理衣服和行李，当摸向装着学费的口袋时，大脑一片空白，里面的800元学费没了。一阵翻找后我确定学费被偷了，司机停车把我放路边后扬长而去，留下呆立的我。

我陷入深深的自责，这800元学费是父母大半年的收成和亲朋好友的接济凑成的。我不敢回家也不敢去学校，在大街上盲目地晃悠了大半天，无奈那天的天气实在太冷，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回到学校。本打算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挣学费，学校的催促、兼职的疲劳、对父母的内疚等情绪袭来，隐瞒几周后我实在无法承受这些压力，暗暗决定瞒



2023年3月，孙汉超赴阿里巴巴总部参观学习

着父母辍学外出打工，从此开启了打工生涯！

10层高楼摔打出职场新技能

父母知情时我已在县城各门店流动打工，穷困的环境让他们只得无奈接受现实，因没有什么技能只能干一些学徒工作，先后做过汽车修理、服务员、保安……这样像浮萍一样漂泊也不是办法，爸爸求助远方亲戚把我带到天津滨海新区建筑工地做了一名小工。

因工作缺乏经验，一次施工中不慎从十多层的高楼掉下来，幸亏中间有很多缓冲物，才捡了一条小命。摔下来后我身上多处骨折，并陷入昏迷，几天后苏醒。老板立马给安排了手术，手术很顺利，我的命保住了，但右腿落下终生残疾，身上的钢钉钢板将伴我终生。现在每逢下雨这些伤口仍会隐隐作痛。

自此我无法干繁重体力活，要生存得有一技之长，我去学习了服装裁切和缝纫技

术，在同学带领下南下江苏昆山闯荡。当时昆山工厂林立，上下班时间熙熙攘攘全是人，现在看来是多好的商机啊，有人的地方就有钱挣，只可惜当时认知有限，只想找个解决温饱。

在面试了多个工厂后我因缝纫技术过硬顺利入职一家服装公司，期间我利用下班时间学会了打字、CAD、OFFICE 办公软件等，现在五笔打字就是当时学的。

服装厂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加班是家常便饭，我整天被困在流水线上，时间长了心里开始躁动起来。偶然机会在老乡介绍下我又进入一家台资企业，在此我接触到严谨的企业管理模式。他们实行军事化的管理，强调标准化和执行力，效率非常高，让我领略到管理的魅力，为我后期积极去各地深造埋下了种子。

我知道自己起点低，苦活累活抢着干，从不抱怨。很快就被高管关注到，把我从一个普通工人提拔成技术员，让我有了学习现代化管理知识和专业技术的机会。

军事化管理固然效率高，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漠，工作环境很严苛，缺乏活力，高管的频繁调动加剧了内部的派系斗争，这让我很不适应，在斗争白热化时我主动提出离职。与以往不同，这次离职少了些迷茫，多了些坚定与信心。

三镇武汉带给我人生大转机

2011年4月，在朋友邀请下我来到武汉谋生。朋友让坐车到汉口站，当时火车直达武昌站，我弄不清汉口和武昌的关系，还



孙汉超参加江夏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弄了个乌龙，从武昌坐到孝感，然后从孝感直达汉口，兜了一大圈。

朋友公司由于管理不善关门歇业，我被迫自寻生路。手拿纸质地图开始找工作，期间打些零工。因 2008 年有过工业厂房 FRP 采光工作经验，加上会用 CAD 看图纸，我利用所学帮武汉的朋友解决工厂车间采光通风问题，随着口口相传客户增多。因为我跟工厂是松散的合作关系，在薪酬兑付上比较麻烦，为此客户建议我注册一个公司，让财务上更规范。

恰逢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号召农民工创业，2011 年下半年，在一间民房里，湖北天瑞采光材料有限公司成立，这就是优靓重工（武汉）有限公司前身。一个一人班的公司，谁都不曾想它会有今天。

伴随中部崛起的发展机遇，厂房越建越大。在累积到一定客户量后，我发现完全靠侧面门窗采光和通风无法满足企

业要求，大白天还得通过人工照明和鼓风机来实现采光和通风，不仅浪费电还给企业带来高额运营成本，工人长期处在压抑的环境也会影响工作效率。

当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厂家被德国、法国等国外企业垄断，在我躬身入局后我感觉这个行业门槛并不高。发现商机后我迅速调整经营思路，把公司的发展方向定了下来：专注解决工业厂房的自然采光通风，致力于让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之后我开始招兵买马，组建了一个七八人的团队，经过我的培训后分散到各个项目上去，我离“一个像样的公司”又进了一步。

100 余项专利筑起天窗领域护城河

随着业务的深入，“草台班子”式的管理模式弊端凸显，我开始引进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成立研发部，高薪聘请相关技术人才，用科技武装企业。

大量的消防起火事故证明，在起火后由于烟雾迅速蔓延，人在逃跑途中吸入烟雾发生意外。2017 年国家对消防法规进行了



2023 年，承接的本田新能源汽车厂智能天窗项目竣工



由优靓承接的李宁工厂智能天窗俯瞰图

调整，出台《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把自然通风采光自然排烟列入强制性条文。我捕捉到新趋势后，在产品上攻关，利用热空气垂直向上的原理新增排烟功能。

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低水平模仿者、低价竞争者层出不穷，极大影响了电动采光排烟天窗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了让行业和公司有序发展，唯有筑高护城河！

实践为创新提供了丰富素材和真实的场景，也是检验成果的试金石。在具体施工中，我们主动搜集问题，积极思考新的解决方式，进而优化产品。

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大家，优靓生产的电动采光排烟天窗实现了最快6秒开启排烟，在烟雾初步形成前打开天窗为室内人员逃生赢得时间；同时有效攻克了屋顶天窗漏水问题，做到了全系列产品的结构性防水，彻底解决了漏水隐患，厂内生产不再受天气影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产品寿命达到20年，减少业主重复更换成本；产品可以有效和屋面光伏结合，自重轻、个头小、通风采光能力强，为绿色工厂节能减排贡献力量……

在我的带领下，公司的电动采光排烟、自然通风天窗产品拿到了近百项国家技术专利，能满足不同业态的需求。目前的产量达到10万方左右，客户包含三一重工、本田汽车、中顺洁柔纸品、海天食品等大型企业。

2023年我们主持起草了电动采光排烟天窗团体标准T/QGCM2794-2023。2024年我参与电动采光排烟天窗行业标准修定。同年公司获评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连续三年被评为湖北省科技型企业。

今年，一个3万平方米的新工厂在黄陂横店工业园如火如荼建设着，预计今年下半年投产。买地建厂房让我目前的经济压力很大，但我不后悔，因为新厂房里孕育着新的希望……

黄际遇在武昌高师创建现代数理教育

◇ 林才伟

黄际遇（1885—1945），字任初，号畴盦，广东澄海人。学贯中西，博通文理，曾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

身）、青岛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是中国现代数理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黄际遇1915年9月任武昌高师教授、数理系主任，1918年兼任教务主任。10年间，黄际遇为该校乃至全国的数理教育事业发展沥尽心血，成效卓著。然相关史料杂散，不易于考查其对地方教育事业发展的贡献。黄际遇所撰《日记》（现存43册）中有部分回忆片段，报纸杂志亦有可考史料，特结合相关文献梳理其执教武昌高师时期的教育、治学之行历，并略作考释，以飨学界。

投身教育 建设学科



武昌高师毕业纪念册中的黄际遇照片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将全国的高等师范教育划分为六大区域，每区设立一

所高等教育师范学校，湖北区的设于武昌。

1913年夏，贺孝齐受教育部委派负责筹办武昌高师，后出任首任校长。1914年11月，由于教育部内部矛盾，另派教育部留日学成归来的张漎代理校长。次年11月，张漎出任校长。

黄际遇在张漎任校期间受邀执教武昌

高师，任教时间有1914年和1915年两种说法。今据黄际遇《怎样研究数学》演讲稿：

“今天惭愧得很，承诸位来此听讲，师大和我很有交情，从优级师范时就常来谈话。民十到民十四，兄弟在武昌高师，当时那边和这边都办有杂志，彼此互寄，所以对于此地师范数理同学很早就有了精神上的联络。”该稿为现场记录，容易受口音等影响误录，其中“民十”当是“民四”，当将其任教时间系于1915年。

张漎思想开明、办学有方，到任后即呈请教育部“变通《高等师范分部规程》，以应需要，而广任用”。同时增设各部教务主任，黄际遇任数学物理部教务主任，陈锦章任博物部教务主任，张锡周任英语部教务主任，姚明辉任历史地理部教务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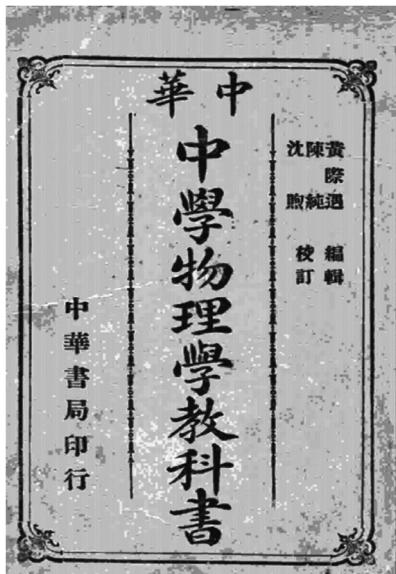
1917年5月29日，根据各地发展教育和学生毕业后择业的实际，武昌高师率先在全国将博物部改为博物地学部，数学物理部改为数学理化部，历史地理部改为国文史地部，调整原有课程，形成专业设置特色。据统计，1918年在校教员已增加到30余人，其中数学理化部有黄际遇、竺可桢、王基荣、李芳柏、周毓莘等。在教学研究方面，



武昌高师全景图

黄际遇贡献良多，在1915年9月至1919年6月期间，先后为数学物理部的预科、本科一至三年级和教育补修科学生讲授了算术、代数、数学、微分、积分、高等力学、三角等七门课程，每周授课18学时，在4位教务主任中授课时数最多，但月薪仅250元。

黄际遇还积极进行学术研究和教科书编撰，成果倍出，裨益学界。1914年3月，《中华中学物理学教科书》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次年7月再版。全书参照日本物理教科书进行编撰，并根据教育部所定中学课程标准编排。1915年2月，《中等算术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刊印，书后附印的教育部审查意见称“该书体例完备，证解亦尚明了”。该书十分畅销，不断修订再版，1925年发行到第九版。1917年，《微积分学》在武昌高师发行，近一千页。4月，翻译日本藤泽利喜《续初等代数学教科书》《续初等代数学问题解义》由商务印书馆刊印，陈训先评价该书“填补了我国高初等代数的‘中间’空白”。据黄际遇长子黄家器的手稿，他还翻译了美国《高等微积分》《近世代数学》及日本《复变量函数论》各一部，讲学时供学生参考。



黄际遇《中华中学物理学教科书》

1918年冬，黄际遇曾奉命往江浙一带考察理科教育。12月30日至杭州，受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浙江教育会会长经亨颐等留日同学的款待。12月31日，参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晚受邀在第一师范演讲《数理化教授之趋势》，经亨颐称：“近来教育思潮，有教科书合本之主张，洵为教材论之正轨，可使一般局部教员有所觉悟。”

1919年春，黄际遇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进行实况及成绩说明书》呈送教育部，后载于《数理学会杂志》1919年第3期。这份长达万言的报告，是黄际遇早期教育理念和教学成果的展示，既包括他对执教武昌高师数年间从事数理学科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又可见其对数理教育理念普及化及实践要求等诸多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富含大量具有开创性的观点和主张，对武昌高师的学科建设影响深远。

黄际遇在报告中，首先介绍武昌高师数理部的历史沿革，是梳理其学科发展史的第一手材料。其次，着重介绍数理部的教育教学情况。报告中，强调“务令学生有自

动之精神，即有整顿思考力与创造精神之精神，不徒以记诵讲章机械的动作作为完职”，要求教师在“教授理化实验技能以外，为之讲演公德、卫生、任事种种之心得”“凡器械之清洁整理装配，皆督学生自为之。凡器械有不完全合适之点，则令学生设法制造或补正之。至误差之讨论尤其测定上有极大之价值，更令学生必详必审，而以其结果登载于日记，以成实验报告”等。

1920年12月，黄际遇受教育部派往欧美考察教育。次年4月3日，与陈锡麒、李仰臣、李统劼、潘淑、孙本文、孙宗钰、王韧等9人赴美。

赴美途中，黄际遇道经日本，在仙台拜会恩师林鹤一。黄际遇在《不其山馆日记》第四册自序中回忆：“门外学深，尝侍明道于海曲。适得居东宗师林鹤一先生之耗。辛酉冬，渡美洲，拜会先生于仙台，门外雪深三尺。”又于1935年12月27日《不其山馆日记》中回忆：“余赴美州，先期特访先生于仙台，霜雪蔽天，履綦连日，笑言杯酒，谈道人玄，临别拜先生于门，师母亦出送玄关，汝约以美州归来再会，先生莞尔曰：‘黄君归国，不急视夫人而远来访汝乎。’”他还在东北帝国大学见到了即将大学毕业的陈建功，邀请其毕业后到武昌高师任教。两年后，陈建功如约到校。

1921年4月28日，黄际遇一行抵达旧金山。5月起，留学于芝加哥大学，师从E.H.moorw、L.E.Dickson等学者。1922年，留美学生获政府资助。《教育公报》载：

“该员负笈重洋，艰苦卓越，留学欧美留学费业经本部提交国务会议，议决由政府速筹二十万元汇留欧留美监督以资接济，并已咨催财政部速筹拨，拨到立即汇往，务专心向学，勿以一时之困，遂弃九仞之功。”同年，

天资聪颖的黄际遇提前完成课程及考试，获芝加哥大学科学硕士学位。“因鄂校电促再三，已决定九月七号乘俄国皇后号回国，九月二十二号可抵达上海。”返武昌后，续任武昌高师数理部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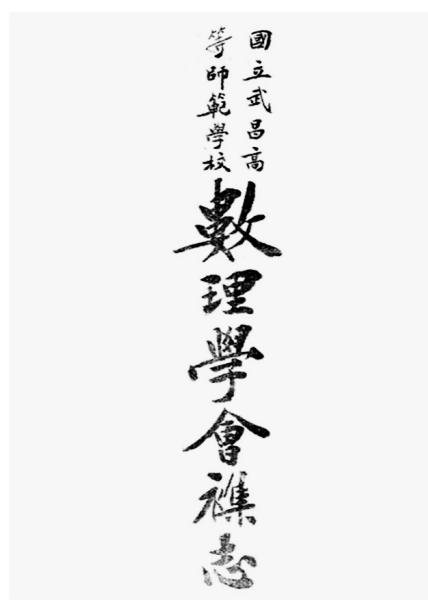
1924年2月，武昌高师升格为武昌师范大学，9月又改名为武昌大学，张继煦仍任校长。学校聘请各部门负责人如下：李步青任事务主任，黄际遇任教务主任并兼任数学物理部主任、数学系主任，李芳柏任理化系主任，陈辛恒任英语部主任并兼任英语系主任，钱稼陵任国文史地部主任，胡小石任国文系主任，张健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陈飞鹏任教育哲学系主任，薛德煊任博物地学部主任并兼任生物系主任，王漠任地学系主任。

组织学会 培养人才

五四时期，国内部分新型高校先后成立社团和学会，各学会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参加指导，一般由有名望的教员担任会长，会员则分为以教员身份参加的特别会员和以学生身份参加的普通会员两种。其中，武昌高师数理学会即是在高等学校以学生为主体、成立最早的数理学术团体，影响显著。1916年9月26日，数理学会召开成立会，通过《武昌高师数理学会简章》，由黄际遇任会长。

1918年，黄际遇发动教员学生集资，并

申请学校津贴发刊《数理学会杂志》。《数理学会杂志》载：“课业之外以学生为主体组成数理学会……际遇等确认欲造成健全之中等教师，不但以仅有数理之技能为满足，必有充分之常识，而后内可以为学，外可以教人，故学会之讲演尤注重此点。自民国七年，更由职教员学生集资并由校年津贴七十元，发刊武昌高等师范数理学会杂志。”2月22日，武昌高师数理学会主办的《数理学会杂志》成立会召开，通过办刊简章。以“研究数理之科学，推广数理之知识”为宗旨，以本校数理学会会员及特别会员组织。《数理学会杂志》“按照数理学会章程所规定，专记数学、物理、化学等科，以资专门之研究，且便于中等学界教授上及学业上之参考”。5月15日，《数理学会杂志》创刊，载有主编黄际遇《武昌高师数理学会杂志发刊词》，表达了对当前学术环境及理科教育现状的关切，呼吁教育界同仁共同努力，推动理科教育的发展，以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民众的科学素养。特别是，黄际遇以武昌高师数理学会为例，展示了



武昌高师《数理学会杂志》第1期书影

学术团体在推动知识传承和学术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希望通过出版杂志等方式，为学者们提供一个切磋琢磨、共同进步的平台，并期望这一努力能够为中国学术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一席之地。总的来看，这篇短短千余字的《发刊词》为我们理解科学、推动学术进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数理学会杂志》第一期刊出后，黄际遇赠送一册给日本著名数学教育家国枝元治。国枝元治长期执教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曾任筹备委员长组织日本中等数学教育学会，著有《无限级数概论》等。他很快回信夸赞《数理学会杂志》的办刊质量及黄际遇花费的苦心，认为《数理学会杂志》有利于促进理科教育的发展：“此次承送来发刊《数理学会杂志》一部，感谢感谢。此为对于斯道奋励之结果，拜见之下，则内容极丰富，又极有条理，苦心之迹在在可见，实认为贵国理科教育所最有益之企画，将来之发展，不胜企祷之至。”

黄际遇重视《数理学会杂志》创刊号，一气发表《数学上种种误谬之理由》《天文学讲义弁言》《报刘恺慈书》《一日之化学界序》《徒步赛跑》《无理数一则 星学一则》六篇文章。此后，第2期发表《自然数之同幂级数之和》《续初等代数学问题解义序》，第3期发表《中心运动与万有引力》《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进行实况及成绩说明书》，第4期发表《解分数方程式之二三注意》《发刊理科丛书缘起》《数理学会之函数观》，



民国初年的武昌高师校门

第5期发表《吾示聋也盲也废疾也夭折也无知也》《畴盦数理杂存四则》，第6期发表《用微系数以求方程式之共通根之法》《畴盦数理杂存（续第五期）》。

1922年3月27日，经职员会议决定，数理学会扩大为数理化学会，增加了化学专业，宗旨改为“联络同志研究数理化并促其发展”。杂志随之从第9期起更名为《数理化杂志》（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Magazine），设有数理图解、器械、专家照片等插画，数学原理学说、数理新闻、数理疑难通信质问者等类别。黄际遇继续担任数理化学会会长，又在《数理化杂志》陆续发表《治数学者之参考书》《行列式之一性质》《日本东北大学与美国芝加哥大学部之课程》等。

数理学会和数理化学会均采用会员制，有选举会、纪念会、讲演会、欢迎会、欢送会、职员会、临时会、审查会等。其中讲演会最为重要，分为特别演讲和普通演讲。特别演讲每周一次，普通演讲每两周一次，交替进行，演讲题目由会员自拟。其中普通演讲每

1917 丁巳級同學全影



武昌高师第一届毕业生与教职员及教育部代表合影

次两人，轮流进行。演讲者包括学生及教师，既有利于学生分享自己的新发现，鼓励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又有利于学生学习教师的科研成果，促进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黄际遇在数理学会、数理化学会陆续演讲《解方程之讨论》《人生观与哲学》《函数论》《自然数同幂级数之总和》《数学之研究法》《数学教授法报告及批评》《数学之分科及近代发达梗概》《行列式之性质》等 20 余次。

黄际遇在数理学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并“对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数理部第一期学员曾昭益以研究数学演题为主而组织的数学研究会加以引导扩充”。曾昭益、方兴楚、张云等学生在数理学会的演讲中表现非常积极，长期的学术训练也助力他

们成为了学界的领军人物。曾昭益即曾昭安（1892—1978），字昭益，江西吉水人，1917 年自武昌高师毕业，黄际遇支持他到日本留学。1921 年，黄际遇将曾昭安写成的研究论文发回在武昌高师的《数理学会杂志》第 7、8、9 期连载。曾昭安后来成为我国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是中国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武汉大学教务长、理学院院长，主办《理科季刊》《武汉数学通讯》，著有《行列式论》《调和函数论》等。

身囿学潮 辞别武昌

1923 年 6 月，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张继煦代理武昌高师校长，修改校章，改部

为系，设置 8 个学系，即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生物系、教育哲学系、国文系、历史社会学系、地学系，决定从下学年起改为武昌师范大学。各系主任亦另行改聘：教育哲学系主任陈飞鹏、国文系主任胡小石、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张健、英语系主任陈辛恒，数学系主任为教务主任黄际遇兼、理化系主任李渭农、生物系主任薛德煜、地学系主任王谟。

是年秋，湖北学潮迭起，黄际遇与李步青等受排挤。1924 年 1 月 23 日《申报》载：“幸当局排解迅速，尚可粗安无事。乃未逾半月，又发生轟轟数起，各执一是，互相攻讦，大概寒假内尚不能了结。”黄际遇在 1935 年 6 月 16 日《万年山中日记》里回忆说：“对客述馆武昌时，学潮迭起，弦歌无声，督军王占元威令之下，管学务者左右两难。时人为缀谐联曰：‘省长难，厅长难，校长更难，教员不亦乐乎；英国狠，法国狠，日本尤狠，中国何足道哉。’然言之刻骨矣。”

1924 年 3 月，武昌师大又因外语系主任问题涌起暗潮，校长张春霆愤走北京，校务由校务主任黄际遇暂代。1925 年初，石瑛接任校长进行人员调整，黄际遇仍任教务主任及数学系主任。7 月，石瑛与耿同派辞退黄侃、黄际遇等大学教授，学生群起挽留，双方各处极端暴烈，7 月 5 日《申报》载有《武昌国立商大师大之暗潮》。9 月，黄际遇应在河南开封的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校长张鸿烈之邀，到中州大学任教。

黄际遇《因树山馆日记》第一册书前有自序，云：“游子轻去其乡，慨然有四方之志。在陈忽思吾党，浩然兴盍归之怀……我年甫冠，担簦五羊。一罢计偕，遂渡东海。羽毛未满，急于自售。津馆五载，方及三十。薄游江汉，一卧十年。京雒之馆，最



为祭酒。翱翔馆阁，缁尘素衣。葆我初衷，卒应齐聘。”

“薄游江汉，一卧十年”，即是黄际遇对自己 1915 年至 1925 年间执教武昌高师的概括。黄际遇虽自言“薄游”，然今追述其武昌高师的 10 年教育实践，培养人才之多，办学贡献之大，当为学界铭记。

林才伟，山东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汉口中学”校友台静农

◇ 张爱清

偶然看到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台静农的履历介绍：1918年就读于湖北省立汉口中学。蓦然发觉这位获得鲁迅先生好评的未名社健将，居然是我们武汉六中的校友。履历中提到的“汉口中学”，就是武汉六中的前身。

1903年，德国传教士买下后湖地区一片土地，创建德华学堂。1908年，学堂建成招生开学，校长是德国人苏乃柏。1917年，受一战影响学校停办。1918年，调整校名为湖北省立汉口中学。1935年，私立汉口上智中学成立。1953年，武汉市教育局接管后，定名为武汉市第六中学。



1908年建德华学堂三层宿舍楼现保存完好

台静农（1902—1990），复姓澹台，后省作“台”，名传严，字伯简，长期写作，精于书法，尚有青曲、闻超、孔嘉、释耒、青辰、静者等笔名。清光绪二十八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1902年11月23日），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集镇一个尚属殷实的家庭。父亲台兆基，字佛岑，青年时期远离家乡，去河北保定攻读政法，思想较为开明，后在芜湖等县法院任职期间，曾设法营救被捕进步青年。台佛岑酷爱书法，造诣极高，直到80多岁高龄仍挥毫不息。台静农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练习书法，又喜收藏。

台静农9岁起入私塾受启蒙教育，1914年春，入本镇明强小学甲班肄业。“明强”虽称小学，但授课水准实已具中学程度。1918年夏，台静农离乡前往汉口中学就读，其父时供职于汉口。当时还是旧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中学需要四年才毕业，然后报考大学。

汉口中学原名德华学校，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汉口当局接收德国人停办的德华学堂而组建，为江岸地区第一所中国人办的公立普通中学，校长是张濂。五四运



1936年时的台静农

动中，台静农在汉口中学即与同学合办反映工农大众受剥削压迫、富有反抗精神的文学刊物《新淮潮》杂志，响应新文化运动。杂志倡导广大青年“立定脚跟撑世界，放开斗胆吸文明”，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腐朽文化。

台静农受五四运动影响，对学校不甚满意，而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对他产生了极大吸引力。他无心再留在汉口中学继续读书，刚好家人也转住北京，因而未毕业就离校经南京、上海到北京继续求学。

1920年夏，台静农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后转该校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同时开始文学创作，继而成为新文学的燃灯人、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之一。1922年1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处女作近百行新诗《宝刀》，就是对封建腐朽社会的宣战书，谴责战争，批判帝国主义。

1925年夏，台静农加入未名社，与鲁迅交往频繁，《鲁迅日记》记载的达180次以上。在11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信鲁迅74封，鲁迅致信台静农69封，收录于《鲁迅书信集》的就有43封。“台君为人极好”（《书信331219·致姚克》）——这是鲁迅对台静农人品的高度评价。

台静农是现代乡土写实派的重要小说

作家，也是未名社的代表性作家。因与韦素园、李霁野、韦丛芜都来自六安叶集，人称“未名四杰”，传为佳话。

抗日战争前，台静农先后在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和厦门大学等校任教。抗战胜利后，为促进台湾战后文化的复归和重建，应魏建功之邀，赴光复后的台湾推广国语，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研究室主任、中文系主任。

1946年10月18日，台静农携家人自沪乘船抵台北，在台大工作直至1973年退休。台静农治学严谨，在文学、艺术、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而驰名，有“台湾第一书法家”的美誉。著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艺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作品行世。

台静农的一生，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几乎是联系在一起，前半生在大陆辗转从事文学创作、教学和进步活动，后半生则在台湾以学者和书法家的形象闻名于世。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因为家国丧乱，他的生命被切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44年的时间生活在大陆，44年的时间生活在台湾，正好等分。原以为仅是跨海暂居，未料内战爆发，让他有家难归。丹心白发一老翁，老来空余渡海心。在台湾，台静农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乡成为故乡。

1990年11月9日，台静农先生因患食道癌在台大医院去世，享年88岁。斯人已逝，留下的是他奋斗的一生和优秀的品格，是他和鲁迅、陈独秀、启功、张大千等大家的友情故事和情系祖国的传奇。

张爱清，武汉市第六中学一级教师

民间文献《灵泉志》中的明楚昭王墓营建（上）

◇ 李 贝 宋 贝 李绿雨



《灵泉志》是一部收录江夏灵泉山地方乡绅赋文、案稿、族谱、家训、疏文、书信等的民间文献，对补充史书、方志记载的不足具有重要价值。

明楚昭王墓，系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子、第一任楚王朱桢的墓葬。朱桢生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楚王，洪武十四年（1381年）就藩湖广武昌府，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因病薨逝，享年61岁，谥号“昭”，葬于江夏灵泉山^①。自昭王始至定王终，明代楚藩八代九王毗邻葬于灵泉山，形成了“同藩诸王同兆域”的排布形式。

《灵泉志》原志所记：“自汉唐而宋、而元、而明，凡湖山景色，人物仪容，与夫风俗教化之美，诗词歌赋之学，往来赠答之章，无不备载。”^[2]清中晚期，江夏县人汤铭新、汤盘兄弟偶然寻得两部《灵泉志》残本，后加以考证，重辑撰成。原志已散失殆尽，现存版本为汤氏兄弟的清抄本。

《灵泉志》中关于龙泉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先贤赞文等，特别是楚藩与龙泉乡绅的争斗，对补充史书、方志记载的不足具有重要价值。但民间文献本身不及史书、方志客观，《灵泉志》所记楚藩与龙泉乡绅的土地斗争，又多为与楚藩有利益冲突的龙泉乡绅所写，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在使用时需要进行甄别。

本文以明楚昭王墓为切入点，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发现，逐一对《灵泉志》中楚昭王墓选址九峰山、楚昭王并未及时茔葬、建楚昭王墓东迁樊哈墓、营建楚昭王墓强占龙泉乡绅土地等说法进行考证，还原其历史真相。

考证一：楚昭王墓选址九峰山

据《灵泉志》记载，楚昭王最初看中的长眠之地是九峰山。相关记述见于邹振奇的《建李都堂盛神像》：“明楚昭王出猎，逐白兔于九峰狮子山，见李氏墓，竟夺其地，掘唐相李鄘之棺。都堂李盛死之，英灵不昧，每与王较。王惧之，平其冢以为寺，约茶、盐二客，出赀巨万，使内官郭成功监修，埋僧人无念于上，作千佛殿以压之。李为祟不已，因修李公享殿，塑像以祀之。吁，昭王本欲得李氏之地，以为日后安身之计。岂知鬼神降祸不已，而卒废为寺场，以葬山僧，在费心思于当年，徒遗恶名于后世。识者已

知其非忠厚开国之道也，惜哉。”^[3]

有明一代，与九峰山、无念禅师有关的寺庙，当为九峰山正觉禅寺。据《九峰山正觉禅寺碑》碑文，九峰寺建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那么掘唐相李鄘坟冢之事应发生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或之前。此时，楚昭王不到而立之年，年富力强，着手坟茔营建之事为时尚早。况且，明朝亲王的坟茔，一般是在身故后由朝廷组织修建。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亲王丧礼成为定制。《明史》载：“亲王丧，辍朝三日。礼部奏遣官掌行丧葬礼，翰林院撰祭文、谥册文、圹志文，工部造铭旗，遣官造坟，钦天监官卜葬，国子监监生八名报讣各王府。”^[4]

虽然九峰寺兴建前亲王丧礼制度尚未形成，但建坟造茔此等大事，也是要奏请朝廷的。在此之前，明朝去世的藩王只有一位，为鲁荒王朱檀，卒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二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四月，“武定侯郭英奏鲁王坟茔成，惟享堂周垣未备，请筑之。上谓工部尚书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劳民也，方当耕种之时，而英请筑堂垣，此岂使民以时之道？英武人不学，惟知筑垣为急，而不知夺农时为重也。’遂止之。”^[5]鲁荒王已逝，太祖尚以“事有不急者，毋用劳民也”之由驳回了为其修建享堂的请求，可知，亲王生前造坟应当是不会被批准的。

楚昭王就藩后，时刻谨守藩礼，即使心仪九峰山，想必也不会在春秋鼎盛之年起掘朝廷命官的祖坟，私自造坟。在正史中，楚昭王一直都是安民济世的贤王形象。洪武三十年（1397年），在征讨吉州叛蛮时，楚昭王因不亲莅军就遭到太祖朱元璋的严厉训斥。如若掘唐相墓、气死朝臣等恶劣



楚昭王墓全景图

行径为楚昭王所为，其势必会受到太祖的斥责，太祖也断然不会为九峰寺赐名。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邹振奇为崇祯己卯科（1639年）举人，所述之事无疑是据其他史料或他人口述后所写。早于邹振奇《建李都堂盛神像》的官方文献中未见相关记载，不过《灵泉志》另外四文——沈世昌《地理闲评》、李璋《陈抄家草稿》、沈宝之《灵泉穴地总记》以及李臻生《灵泉山李氏录》却有类似叙述。

沈世昌《地理闲评》记载：“江夏名山，尽于九峰之狮子山。唐李邕、李暄诸墓在其上，俨然天地居尊之象也。楚藩平之以为寺，移其冢于盘龙山，李氏因以衰焉。”^[6]

李璋《陈抄家草稿》记载：“为矫诏抄家，冒死陈情事，臣住江夏灵泉，有祖坟一段，坐落保安里，土名九峰。先世远祖李鄘，字建侯，由天宝末年举进士，官拜平章，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朝廷赐葬九峰

狮子墩上，李善、李邕、李暄合计四墓，丰碑高塹，石马翁仲，凿凿可据，历今九朝，千百余年矣。于前岁九月内，惨遭楚府王朱，图谋风水，起掘四冢，深至丈余，弃棺抛尸，奇祸不测。臣兄李珍叩阍，蒙许其照旧安葬，是洪恩覃敷，上通九霄，下辙黄泉矣。今又于本年二月内，约同茶盐二商，出银数千斤，鸠集工匠，将山凿为平地，建为佛寺，请旨敕赐，永为施主。复矫诏文，抄没臣家，先父都堂李盛，因气身故。臣思上年圣恩，既许照旧安葬，则今日之灭族抄家，恐非皇上本意，是以奔诉阙下，重渎天听。如果出圣裁，死亦甘心。倘圣恩宽宥，赦臣不死，则矫诏欺君，罪有攸归。专候圣旨，死罪无罪，以战兢待命，为此渎陈。”^[7]

沈宝之《灵泉穴地总记》记载：“更观唐李善、李邕、李暄、李鄘四墓，俱葬九峰狮子山后，楚昭王夺地为九峰寺，遂迁葬于前盘山。”^[8]

李臻生《灵泉山李氏录》记载：“唐相李廊，葬九峰，风水最绵远，明楚昭王掘移为寺。”^[9]

其中，沈世昌、李璋较邹振奇生活年代更早^[10]，沈宝之推测与邹振奇同时期或更晚^[11]，李臻生文献不可考。虽然四篇文本都有可能是《建李都堂盛神像》的史料来源，但四篇文本均只言夺李氏墓地建寺，并未提及营葬之事。值得注意的是，四篇文本中只有《陈抄家草稿》详细叙述了事件过程，且《建李都堂盛神像》与《陈抄家草稿》在很多叙述细节上存在相似之处，《陈抄家草稿》或为《建李都堂盛神像》主要史料来源。

但经查阅史料，《陈抄家草稿》也有不少叙事细节的真实性、可靠性是有待商榷和推敲的，如最为关键的事件发生的时间问题。汤铭新考证的李璋为正德癸酉科举人，《湖广图经志书》亦载有“李珍……李粹然、李璋俱正德癸酉科”^[12]。但《湖广图经志书》^[13]《寰宇通志》^[14]等记载的湖广江夏县人李盛，却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戊辰科进士。李璋、李珍与李盛生活年代相差百年，父子关系是不成立的。虽然《陈抄家草稿》也没有指明“将山凿为平地，建为佛寺”之寺就是九峰寺，但史料可查，建于九峰山狮子峰下又得朝廷敕赐的佛寺，只有楚昭王为无念禅师修建的九峰寺。如此看来，《陈抄家草稿》所述强掘李氏墓地建佛寺之事，似乎又可能发生在楚昭王时期。究竟事件发生于楚昭王、李盛所在的洪武年间，还是百年后李璋、李珍所处的正嘉之际呢？

《灵泉志》收录的其他文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按照《陈嘉言回奏稿》^[15]的记述，灵

泉山张、李二氏与楚府的夺地纠纷“数十年叠案如山，先帝并未剖决，朝臣不敢公言”，直至嘉靖年间，世宗皇帝才予以处理。陈嘉言建议：“由臣等处分，以原日拨换为据，其余八姓之坟，仍许祭扫……至于张忠文石坊庙宇，出于宋高宗敕赐，当修之以为天下后世为忠臣者劝。李宰相蓼莪祠堂，出于唐肃宗敕赐，当存之以为天下后世为孝子者劝。即此两处，断还二姓，依然子孙居住奉祀，楚藩亦不得强据，绝人宗祀。”世宗皇帝予以准奏。张鼐递交的《参楚藩本》也提到，“嘉靖批旨，如再掘张姓冢，开棺迁葬者，按庶民例处斩”。^[16]

张廷凤、张廷鸾的《再参楚藩本》^[17]亦有叙述，“为违旨故掘，痛哭陈情事，上年圣旨敕谕楚府，如有再掘张姓冢，开棺迁葬，按庶民例处斩”。但楚府无视圣旨，第二年，“楚王贵宗朱三人等，又掘先朝祭酒臣辂之墓，唤石匠王成，凿洗三日”，张氏再参楚藩，“嘉靖批旨：恸恨无涯，着三法司将犯法三人拘来，亲讯杖毙”。

再看《陈抄家草稿》所记：“臣思上年圣恩，既许照旧安葬，则今日之灭族抄家，恐非皇上本意，是以奔诉阙下，重渎天听。”文中所述事件的发展脉络，与《陈嘉言回奏稿》《参楚藩本》《再参楚藩本》十分吻合。也有学者认为，《陈抄家草稿》叙事节点与《再参楚藩本》为同一年^[18]。

由此推测，龙泉山张、李二氏与楚府的土地官司由来已久，但直到嘉靖年间朝廷才予以剖决，下令楚藩不得强占二姓祖坟，如若再犯，依庶民例处斩。但楚藩第二年就违背了圣旨，继续强掘张氏、李氏墓地，才有了张廷凤、张廷鸾的《再参楚藩本》和李璋的《陈抄家草稿》。可能是因为时间久远，文本又有缺失，后世根据民间传说在传抄、

补录过程中，将事件记录为更具故事性的楚府掘墓建九峰寺。而邹振奇在考证李珍为洪武年间人、九峰寺亦建于洪武年间后，将事件的主人公锁定为楚昭王，并由楚府与龙泉乡绅的土地纠纷源于楚王营葬之事，推测楚昭王是为了营建陵寝而强掘李氏墓地，因都堂李盛冤魂缠身，不得已才改建为九峰寺。

虽然楚昭王没有将九峰山辟为自己的陵寝，但楚昭王无疑也是心仪九峰山的，为此将九峰寺、巴陵王墓的选址都定在了九峰山。《九峰山正觉禅寺碑》载：“因思游猎所经，去洪山东四十里许有胜处焉，师亦旧所往来，尝目识之。不谋而合，遂矩为禅定之所。”^[19]乾隆《江夏县志》云：“明楚昭王世子巴灵王卒，卜葬此山（九峰山），掘坎不三尺雷雨骤作，从坎中得石刻真武二将，绿苔斑驳，王异之，命建为观（真武观）。”^[20]

可能是因为这两件事，后世在不加考证的基础上，将楚昭王为无念禅师修建九峰寺，将巴陵王葬在九峰山之事，误传为楚昭王茔墓选中九峰山，后改建为九峰寺。明中后期，全国范围内宗藩侵占民田之事已屡见不鲜，楚藩也强占了李氏在九峰山的山场，不容李氏认冢。此后，故事又逐步演变为改建九峰寺，是因为楚昭王强掘了九峰山李氏墓地，气死都堂李盛，因李都堂为祟不已才平冢建寺。或许邹振奇《建李都堂盛神像》所述，已经是当时世人口口相传的版本。

楚昭王以龙泉山为陵寝，不是夺九峰山不成的另辟他地，而是龙泉山的风水更胜一筹。明洪武楚府纪善贝翹《九峰山正觉禅寺碑》描绘的九峰山：“众山环绕，峰列为九。前一峰若覆盖状，后连峰又若秋涛奔涌，合沓而至。地势幽深，树石茂润。有泉漫流，左右交注，汇为大池。”^[21]明洪武楚府长

史管时敏《过龙泉山》作“夹口青山四面来，山重拱挹水萦回。千年胜地龙泉涌，一日佳城凤穴开。佛子岭头云拥树，仙人石迹雨生苔。岳灵应为长呵护，五色光生紫翠堆。”^[22]

可见，龙泉山的风景丝毫不逊于九峰山。《朱氏宗谱》载：“楚王请堪舆先生傅姓谋地，看中灵泉。”^[23]《葬书》云：“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24]九峰山只有泉水汇成的大池，而龙泉山濒临梁子湖，三面环水。九峰山群峰并峙，而龙泉山山脉环绕，中间为谷地，外藏风内聚气，天马峰、玉屏峰两条山脉又相汇于珠山，形成“二龙戏珠”之势。从风水角度来说，龙泉山远胜于九峰山。

注释：

[1] 今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龙泉山。汉称江夏山。唐初称夹山，唐天宝末年，因宰相李磾开基造屋，凿地得泉，改称灵泉山。宋代更名为龙泉山。明清多称灵泉山。

[2]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页。

[3]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54—155页。汤氏兄弟所作序、批注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4]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1974年，第1466—1467页。

[5]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一，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庚子。

[6]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9页。

[7]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

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52—154页。

[8]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6—177页。

[9]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56页。

[10] 《灵泉志》中还收录有沈世昌的《上楚愍王书》，可知沈世昌大致生活于楚愍王时期，即嘉靖年间。据汤铭新考证，李璋为正德癸酉科(1513年)举人，《湖广图经志书》亦有“李珍……李粹然、李璋俱正德癸酉科”的记载，李璋大致生活于正德年间。

[11] 据《灵泉穴地总记》中“张公辂墓在天马峰之西，开棺，袍带依然，稍迁，今贺妃寝是也”的叙述，此文的创作时间应晚于贺妃下葬时间，而贺妃为楚藩末代王的王妃，沈宝之当生活在明末或更晚。

[12] (明)薛纲纂修、吴廷举续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一百一十，明嘉靖元年刻本。

[13] (明)薛纲纂修、吴廷举续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一百七，明嘉靖元年刻本。

[14] (明)陈循撰：《寰宇通志》卷五十武昌府二一，民国三十六年玄览堂丛书续集影印明景泰刻本。

[15]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35—137页。

[16]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40页。

[17]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

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40—142页。

[18] 田宝中：《明代楚藩的经济状况与宗室斗争》，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19] (明)薛纲纂修、吴廷举续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三十八，明嘉靖元年刻本。

[20] (清)陈元京修、范述之纂：《乾隆江夏县志》卷五祠庙二十一，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21] (明)薛纲纂修、吴廷举续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三十八，明嘉靖元年刻本。

[22] (明)管时敏撰：《蜕窓集》卷六二十二，四库全书本。

[23] 《朱氏宗谱(宝善堂)》第一卷。

[24] (晋)郭璞撰：《葬书》内篇六，四库全书本。

李贝、宋贝，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馆员；
李绿雨，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助理馆员

父亲童世光的入党介绍人王平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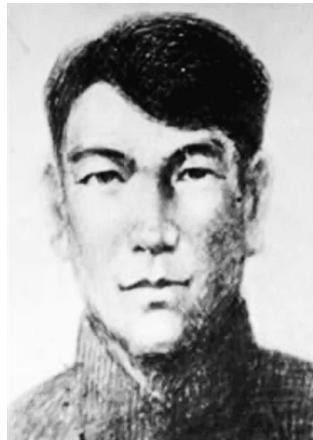
◇ 童晓晋

从小，我就经常听到王平章这个名字，因为他是我父亲童世光的入党介绍人。1926年，父亲在湖北沙市晴川书院（汉阳会馆）得到王平章的引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坚定地踏上革命道路。

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

王平章，1901年出生于湖北汉川，1920年考入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参加陈潭秋创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1924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共产党，后回家乡创办《汉川青年》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爱国反帝斗争，建立中共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

1927年，大革命遭遇失败陷入低潮，汉川瞬间被白色恐怖笼罩。在这艰难时刻，我父亲和众多共产党人毫不畏惧，依然在王



王平章遗像

平章、程棣华等人的领导下，隐蔽在汉川各地，顽强坚持地下活动。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每一次秘密会议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每一个决策都伴随着生死抉择。

国民党桂系军阀掌控湖北后凶残暴戾，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进行极其残酷的血腥镇压。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嚣：“宁可错杀

一万，不可放过一个。”汉川这片曾经革命火热的红色土地，一夜之间弥漫血雨腥风。为了留存革命火种，众多共产党人不得不转移到上海，我父亲也于1928年3月来到上海。

潜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在上海，父亲一方面努力寻找党组织，另一方面积极寻找掩护职业。父亲有个亲戚叫曾昭常，是他燕京大学的同学，还是冯玉祥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一次偶然机会，父亲去找曾昭常时，正巧碰见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弟弟李连山。李连山不仅是他燕京大学的同学，而且同是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就这样，父亲很快被安排在冯玉祥的“大中通讯社”英文部，担任翻译兼记者，每月能有40块大洋的薪水。

这年7月，王平章也来到上海。他通过给他拉黄包车的沔阳人牵线，找到汉川县委书记张素吾、县长何澄之及教育部长胡惠民。然而，他们的生活状况极为艰难，都是拉黄包车的车夫，每天起早贪黑，那被汗水浸湿的衣衫诉说着生活的艰辛。胡惠民的双手布满了老茧血泡，何澄之的脸庞被烈日晒得黝黑。王平章看到同志们过着如此艰苦的日子，心里阵阵痛楚，眉头紧锁，双唇紧抿。但他仍然坚定地给同志们鼓劲：“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会有办法挺过去的！”

一天晚上，胡惠民拉完黄包车回来，一进门就兴奋地对王平章说：“我看见童世光了！他在法租界寿宁路文元坊，穿得很讲究，背着一个黑包包，骑着钢丝车（自行车）飞驰而过。”王平章大喜过望，他判断父亲肯定有了职业，而且是一份较为体面的职业。于是，他吩咐大家一定要找到父亲。



1986年，童世光在入党60周年之际，重回沙市晴川书院旧址缅怀先烈

第二天，大家分头寻找。王平章则以捡破烂作掩护，在文元坊四处探访。他身上的衣服破旧不堪，头发凌乱，眼神却充满了急切与期待。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在寿宁路上找到我的父亲。

第三天，父亲见到王平章和同志们，也是喜不自禁，那激动的神情仿佛久别重逢的亲人。他说：“我现有公务在身，晚上请你们吃饭，地点在霞飞路的五芳斋。”说完，只得骑车匆匆离去。

晚上，大家在五芳斋欢喜相聚，气氛异常热烈，父亲讲述了自己在冯玉祥“大中通讯社”的工作情况。说完，从包里拿出沉甸甸的20块大洋，放在了王平章和张素吾的面前说：“这是我刚发的薪水，以后每个月我都这样给你们，以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有了我父亲经济上的资助，王平章在上海得以安定下来，随后成功找到了党组织。因为我父亲有冯玉祥“大中通讯社”翻

译、记者的特殊身份，王平章安排他定期为党组织送党刊《布尔什维克》等文件书报，还有苏联、法国的进步杂志。

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同时也充满危险。父亲不仅要熟练骑车，还要熟悉路线，跑得快，否则就有被巡捕、警察抓捕杀头的危险。为了安全，父亲把《布尔什维克》的封面巧妙换成《少女怀春》的封面。每次出门前，父亲都会仔细检查包裹，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心中充满紧张与担忧。他一次次机智躲过巡捕的严格盘查，顺利完成任务。

回到家乡发动秋收暴动

上海的白色恐怖同样十分严重，父亲建议王平章和同志们转移到庐山脚下星子县的名刹——海汇寺，那里广泛接纳信众难民，相对较为安全。

王平章前往星子县，在海汇寺巧遇一个僧人，竟是曾经的同志，两人四目相对，眼中满是惊喜与感慨。在交谈中，又打听到了好几个同志的下落。王平章信心倍增，随即以此地为据点，将散落的共产党人聚集起来，坚持不懈地开展地下工作。

这个看似平凡的小故事，生动彰显出王平章等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无论所处的环境多么险恶，都无法动摇他们坚定的革命信仰；无论斗争多么艰苦卓绝，都不能摧毁他们顽强的革命斗志。

不久，王平章参加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后，奉命重返湖北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兼汉川、天门、京山、应县四县暴动总指挥，发动鄂中地区秋收暴动。1929年11月起，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红25军政治委员，参加领导鄂豫皖苏区的建设和历次反“围

剿”斗争。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参与领导重建红25军，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1933年1月，参与组建红28军并任政治委员。

1933年3月中旬，红28军奉命向鄂东北转移，行进至河南商城时，与白军一个旅遭遇，王平章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父亲童世光，1925年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参加革命，由王平章引导加入党组织。1927年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他将在武汉大学预科就读的小弟童世秀动员回家，参加了贺龙的红军部队。王平章回湖北后，他也从上海回汉川参与发动暴动，其后在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中，四次被捕遇险而矢志不移，口头禅是“当共产党就是要提着脑袋干革命”，只为人民求解放。

抗日战争中，父亲协助陶铸在应城汤池举办游击训练班，后任鄂豫皖边区专员和新四军五师国际联络部长，直至参加“中原突围”到华北。解放初期，他从中央政法委奉调回湖北接管省立农学院，后辞去省教育厅厅长一职，埋首创建和发展华中农学院，一生不计地位高低和个人得失。

父亲始终不忘他的入党介绍人，时常讲述王平章的故事，以此激励自己和教育子女。我在父亲晚年协助整理回忆录时，总是心潮起伏。今年，也是父亲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父亲和革命先驱王平章。

童晓晋，华中农业大学教育培训学院
原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童世光之女

说“不服周”

◇ 朱建颂

编者按：武汉方言“不服周”同时有“不服啄”“不服诌”等多种说法，坊间争鸣不断。武汉市政府参事胡全志热衷于武汉方言研究，与武汉方言专家朱建颂先生多有交往，转来其生前所撰《说“不服周”》一文，对“不服啄”之说进行辨析。同时，中南民族大学年轻教师姜照中，从另一角度提出《“不服诌”来自京剧》。本刊以“多说并存”原则一并刊发，供大家研究参考。

关于“服周”和“不服周”，向来有争议。《“服 zhuo”考》（《湖北日报》2001年7月28日副刊“东湖”）一文说，看到母鸡群欺生，凡新来的母鸡，它们必挨个儿在其冠上啄几下，而新鸡则趴伏地上，一动不动地挨啄，服了，以后就不会再被啄了（由此认为“服周”是“服啄”）。

这说法不可信。首先，这个词的武汉音本来是zou（阴平），由于音变而近似zo（阴平），而不是zhuo（或zuo）阴平，武汉话里“龟山头（咤）”“黄鹤楼（罗）”“青

皮豆（舵）”“哈（捞）钱手（所）”“翻眼猴（活）”“屁屁油（约）”等都是，是所谓“小称音变”，等于把一般名词“儿化”了，这里是把ou变读成近似o。为此，据湖北音（包括武汉音）当写作“周”。再说，这个以鸡为喻的“服啄”，意思是“低头、投降”，跟“服周”原意并不相侔。

其实，早有人对此作过考察，笔者也作过探讨，请参看——



2010年11月6日，胡全志邀请朱建颂（左）在汉阳晴川阁与网友交流

笔者 1992 年编著的《武汉方言研究》：“气不忿、不忿（不服气、不平），也说‘不服周’。”

笔者 1995 年编撰的《武汉方言词典》：“服周 服气，由衷地信服。（例：这样一看他才服周了！你服不服周？）”

何祚欢 1996 年的小说《舍命的儿子》：“这一伙人只晓得他是个大老板，就没注意他保命的一套办法多么有用，反以为他是真的服了周。……刘怡庭表示服周，不用吩咐就坐到马桶旁边。”“服了周”的脚注是：服了周：武汉方言。据传此语出于春秋争霸时楚民口语“不服周”，后被引申用于表示服气或不服气。（例：“服了周”“不服周”。）

更早的汤今我《楚谚考》（《新生月刊》1943 年 4 月号）：不服周出于《左传》“楚使王孙满问鼎”，是看不起周；又如“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至此更明显地不服周管了。故称不服人就一概用“不服周”三字去替代，正是十足道地的楚人。

此文所述，涉及《左传》记载的两件事：

一是鲁僖公四年（公元前 656 年），齐桓公伐楚，责之曰：“尔贡苞（包）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过滤）酒，寡人是微（追究）。”意思是楚国贡品未送到，以致误了大事。——楚成王不如时进贡的行为，表现出不服周王室的管辖。

二是鲁宣公三年（公元前 606 年），楚子（庄王）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边界）。（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慰问）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这就是所谓“问鼎”，表现出楚王不仅不服周，还想取而代之。



2011 年 11 月 24 日，胡全志邀请朱建颂（左）在解放公园“三优堂”出席方言沙龙活动

附带说一下，《长沙方言词典》中有一条：“服行=服鲰、服输。”（鲰是同音借字，长沙武汉鲰、周同音）也从侧面证明，这个词的音是服 zou (zhou) 而不是服 zhuo (zuo, zo)。江西九江等地也有“服周”的说法。我们知道，长沙（乃至湖南）、九江（乃至江西）也属于古楚国范围。

看起来，写作“不服周”较合适。

至于“（不）服周”的说法究竟是何时出现的，由于文献无征，不好猜测。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事实早已存在，何时概括成一种观念，并见诸语言中，那就要看客观条件了。这就是必然与偶然的关系。武汉人把芋头谑称为“皇帝的脑壳”，只能是在帝制废除之后。至于见诸文字，那就更不定了。

朱建颂，武汉文史研究馆馆员、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22 年 2 月 13 日逝世，享年 96 岁。著有《武汉方言研究》《武汉方言词典》《武汉民间游戏》《武汉方言概要》等 20 余部语言学著作，被誉为“武汉方言研究第一人”

“不服诒”来自京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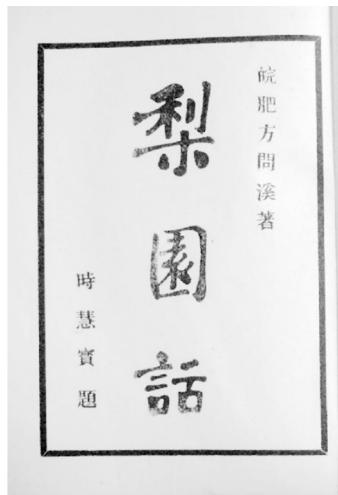
◇ 姜照中

武汉方言 [pu213 fu213 tsou55] 在《武汉方言词典》中记作“不服周”，其中的“周”字下标“。”，即被认为并非本字。《武汉方言词典》对 [pu213 fu213 tsou55] 的解释为：“不信服，不服气：我对这个事就是～！你还蛮～咧？”^[1]该说法儿不仅见于使用西南官话武汉方言的武汉三镇，也见于周边的一些地方，如说西南官话的荆州^[2]；说黄孝话的黄陂^[3]、武穴^[4]；说赣语的咸安^[5]。

1989 年的《汉阳县志》（今蔡甸，当地方言与武汉方言非常接近）将这个说法儿写作“不服诹”^[6]。据《集韵》，“将侯切”，“诹、讒，咨事为诹，或作讒。”^[7]可知义为“商议”的“诹”与武汉方言 [pu213 fu213 tsou55] 中的 [tsou55]，二者的语义并

不相符，“不服诹”这个写法儿不能成立。大部分有武汉背景的学者，如曾任武汉大校长的刘道玉^[8]、湖北评书名家何祚欢^[9]，特别是因央视“百家讲坛”而影响较大的易中天^[10]，则乐意将这个说法儿写作“不服周”，并认为它与楚国对周朝的抵制有关。但因为周朝对口语来说未免过于古奥难懂，且目前看来“不服周”最早见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材料^[11]，所以“不服周”这个写法也很难成立。

其实，武汉方言 [pu213 fu213 tsou55] 应写作“不服诒”。据《集韵》，“留尤切”，“诒，小言私授谓之诒。”^[12]则“不服诒”义为“不服从小言私授、不服从训诫”，合乎《武汉方言词典》中的解释。且根据从中古音到武



汉方言的变化规律，“诌”的字音正应该是[tsou55]，也与[pu213 fu213 tsou55]中所见的相符。但在武汉方言中，除了用于“不服诌”以外，“诌”这个词儿极为少见。那么“不服诌”应该是从别处借进武汉方言的，其直接来源则是京剧行业所用的北京方言。

在北京方言中，“诌”有[tʃou55][tsou55]两个字音^[13]，前者符合从中古音到北京方言的变化规律，属于主体层；后者不合规律，是从别处借的。而“诌”在北京是个常用词，如文康（满洲镶红旗人）以北京方言创作于19世纪上半叶的《儿女英雄传》，其第三十八回：“诌几句盲词瞎话，当作他暮鼓晨钟”；第四十回：“还是著书的那个燕北闲人在那里因心造象、信口胡诌呢？”^[14]京剧也在19世纪的北京形成，北京方言“诌”进入京剧行业实在顺理成章。

方问溪（安徽合肥人）出身梨园世家，其曾祖、祖父都曾供职于升平署。他出版于1931年的《梨园话》一书，是第一部戏曲专题的汉语辞书^[15]。该书对“服诌”给出了解释：“服诌。服人劝解。谓之服诌。”^[16]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居北京的中国研究专家波多野乾一（1890—1963年，日本大分人）也说，在京剧行话里，“服诌”

是“佩服之谓”^[17]。如武净名伶刘奎官（山东历城人）记下了其师爷，曾供职于升平署的范福泰鼓励他学习杨小楼（安徽怀宁人）时所说的话：“这一年来，你看出他比你好，佩服了，服诌了，这是你进了一步的表现”^[18]，其中“服诌”的意思正合乎方问溪、波多野乾一的解释。

武汉，特别是汉口地方，长期以来戏曲市场发达，本地用武汉方言的汉剧、来自黄孝地区用黄孝话的楚剧，乃至来自外省的昆曲等各类戏曲都受欢迎。武汉人也很乐于借用来自戏曲的行话^[19]，如武汉方言中语义为“造声势、扰乱”的“打闹台”（行话原义“打通儿”）、语义为“开始”的“开锣”（行话原义“开演”）、语义为“花样”的“板眼”（行话原义“节拍”）等，其实都来自戏曲行话^[20]。

1898年，京剧伶人邱玉成、张胜奎受聘从北京到汉口演出，自此至辛亥革命前，京剧在武汉日渐风靡。而自辛亥革命至武汉沦陷的20多年则是京剧在武汉的鼎盛期，“四大名旦”等京剧名角儿都来武汉登台^[21]。总之，正如罗汉（本名罗维翰，广东番禺人）发表于1915年的竹枝词所说，20世纪前期的汉口在戏曲方面的口味是“昆班歇后尚京班”^[22]。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武汉人从京剧艺人那儿学到了“服诌”这个说法儿。

武汉方言虽然层次颇为简单，但还是有很多像将“服诌”这样从别的方言借来的说法儿。有的甚至更为突兀，几乎把别的方言的字音也囫囵借来了，并不做太多折合，如多音字“厕”[tshɿ35]:[tshə213]、“枢”[tɿhy55]:[cɿy55]，“：“前为符合从中古音到武汉方言变化规律的字音，“：“后的字音则很可能都来自北京方言或普通话。

除了“不服诌”[pu213 fu213 tsou55]，



梅兰芳与“汉口梅兰芳”南铁生会见
报道，1933年3月2日《北洋画报》

武汉人也说 [pu213 fu213 tsou55]^[23]。这儿的 [tsou55] 其实是“诌儿”。在武汉方言中，名词后加儿缀，一般用以表小或表亲切随便；儿缀只能用于最后一个音节有韵尾的词儿；且一旦使用儿缀，必然发生类儿化音变。因为武汉方言中“儿”的字音为不卷舌的 [w213]，所以类儿化音变也不卷舌。韵母 [ou] 经类儿化音变会变为 [o]，具体如以下几例：“豆” [tou35] → “蚕豆儿” [to35]；“头” [thou213] → “老头儿” [tho213]；“口” [khou42] → “老两口儿” [kho42]^[24]。“不服诌儿”的出现，表明来自京剧的“服诌”这一说法儿，已经完全被武汉方言接纳吸收了。

随着武汉的发展，武汉方言 [pu213 fu213 tsou55]、[pu213 fu213 tsou55] 越发为人们所知，也常在赞赏武汉时见诸媒体。它们



程砚秋在汉口演出报道，1935年4月27日《北洋画报》

的真正写法儿“不服诌”“不服诌儿”，虽然没有“不服周”的宏大叙事，但胜在更有解释力，且其涉及北京、武汉两座城市和京剧，也很值得玩味。

注释：

- [1] 朱建颂：《武汉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 [2] 王群生、王彩豫：《荆州方言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6页。
- [3] 胡庆华：《黄陂方言拾零》，武汉：武汉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 [4] 湖北省武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济县志》，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第836页。
- [5] 吴培根：《咸安区方言志》，武汉：崇文书局，2012年，第139页。

- [6] 汉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汉阳县志》，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年，第505页。
- [7] 丁度等编：《集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述古堂影宋钞本，第271页。
- [8] 刘道玉：《珞珈野火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7页。
- [9] 何祚欢：《舍命的儿子》，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 [10] 易中天：《读城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0页。
- [11] 王建福：《夜袭盘龙镇》，湖北人民出版社编：《光辉永照》，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1页；魏开明：《迎书记（湖北道情）》，湖北省荆州地区文化局创作组、湖北省荆州地区文化馆编：《荆州文艺》1979年《庆祝建国三十周年曲艺专辑》，第37页。
- [12] 丁度等编：《集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述古堂影宋钞本，第265-266页。
- [13] 黄名时：《普通话异读词的北京音》，陈学超主编：《国际汉学论坛》卷2，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25页。
- [14] 文康：《儿女英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50、728页。
- [15] 曲彦斌：《论方问溪〈梨园话〉及其戏剧史意义》，《文化学刊》2014年第6期，第91-104页。
- [16] 方问溪：《梨园话》，北京：中华印书局，1931年，第51页。
- [17] 波多野乾一著，鹿原学人译：《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21页。
- [18]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刘奎官的表演艺术》，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 [19] 汪国胜、赵爱武：《从地域文化看武汉方言》，《汉语学报》2016年第4期，第63-64页。
- [20] 朱建颂：《武汉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6-67、153、237页。
- [21] 刘志斌：《武汉京剧的滥觞和发展》，《武汉文史资料》2003年第10期，第40-43页；胡非玄：《清末民国京剧的武汉传播及其对汉剧发展之影响》，《文化遗产》2021年第6期，第90-92页。
- [22] 罗汉：《京班戏园》，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 [23] 李栋：《解码武汉人的“不服周”》，《武汉宣传》2015年第9期，第48页。
- [24] 朱建颂：《武汉方言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年，第43页；吴振国：《武汉话中的类儿化音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99页。

姜照中，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讲师

本研究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2JZD024）等资助

楚菜文化与国际赛马的奇妙组合

——武汉商学院校史馆

◇ 范 勇

武汉商学院校史馆，位于武汉经济开发区风景优美的后官湖畔，地处校园中轴线最北端，2017年5月16日正式开放。展馆以“一主两翼”功能

布局，设有湖北第一家楚菜博物馆、武汉国际马术馆，彰显应用型大学文化教育的探索之路。

武汉商学院作为培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商科大学，校史馆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分为序厅、主展厅、专题

展廊三大板块，举办的特色专题陈列，散发着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让观赏的学生与社会观众，感触深刻，遐思回味。



楚菜博物馆

想要了解楚菜及湖北饮食文化，楚菜博物馆是必选场馆。湖北武汉是鱼米之乡，饮食文化丰富，融南北各派之精华的楚菜（亦称湖北菜、鄂菜），更是历史悠久，风味独特。楚菜发展到如今，已有3800多个菜品，名列中国十大菜系之一，在中国烹饪百花园中独树一帜。楚菜博物馆不仅是湖北省目前唯一一家弘扬楚菜烹饪饮食文化的博物馆，而且还收藏着百余件与楚菜相关的精美藏品及菜模标本，并举办有专题陈列对外展出。

一部源远流长的楚菜变迁史，在这里徐徐展开。展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示了湖北楚菜的历史发展、风味流派、名菜名点、名店名师、饮食器具。同时，针对楚菜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特色食材、烹饪器

具、菜品小吃，穿插相关模型或老物件。在这里，武汉老字号“四季美”汤包的老式三件套门牌、提盒、簸箕，“小桃园”煨汤的龙纹砂铫子，“蔡林记”掸面的掸子，沔阳三蒸的蒸笼、蒸馏、蒸甑等传统用具……配合江城饮食文化的老照片、影视播放及现场互动，将每个参观者带入美食烟火，沉浸舌尖上的楚菜风味，品悟江城餐饮老字号的文化韵味，流连忘返。

武汉国际马术馆

武汉是近代中国最有名的“赛马之都”，当时上海只有“上海”“江湾”两家跑马场，而汉口却有“西商”“华商”“万国”三家跑马场，居全国之冠。近代武汉赛马每逢春秋两季进行，分别称为春赛与秋赛，每次赛马约7天。每逢开赛之日，成千上万的武汉市民争赴马场，买马票，购彩票，万头攒动，





人声鼎沸。进入21世纪，随着体育、旅游、文化融为一体，武汉再度成为中国现代赛马之都，中国武汉国际赛马节享誉海外。

想了解“赛马之都”的前世今生，武汉国际马术馆带你穿越时空，重现昔日武汉赛马盛况；跟随武汉赛马文化的发展历程，一睹百年赛马之都的风采魅力。在弘扬武汉赛马文化的专题展览中，以“马”为主题，选取武汉马文化、武汉马术、中国赛马与世界赛马运动等视角，展示收藏的历史照片、图片，陈列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各式马术器具——骑师服、马球棍、驯马鞭、洗马梳等。在展厅中央，还复原有两匹马模型，摆设着民族赛马、速度赛马等不同用途的马术装备。从英国进口一匹价值数十万元的速度赛马电子模拟马，在全国高校中是独有的，参观者可现场沉浸式感受速度赛马的骑乘，体验武汉赛马的特色魅力。春秋代序，日月淹留，历史的发展变迁，故事流传在光阴里，刻进了珍藏的物件中，筑起可供人们追忆的

历史回廊。武汉商学院校史馆藏品，类别多样，部分特色文物独具魅力，承载着悠远历史，诉说着动听故事，演绎着城市记忆。

龙纹砂铫子

这件龙纹砂铫子颇有来头，由武汉煨汤技艺传人、望旺煨汤屋喻少林捐赠。其父喻凤山，是武汉老字号“小桃园”第二代煨汤大王。铫子，也作吊子，口大有盖，两旁有耳，一般用砂或金属制成。这件龙纹砂铫子是民国时期的原件，烧制于湖南名窑，原材料为陶土和钢砂，保障煨出的汤保温好、不变色、味道纯正。它的造型古朴端秀，装饰巧妙精美，龙首形双耳，舒展飘逸的龙身与铫子圆腹融为一体；盖子上盘旋着一条鳞片清晰的龙，张嘴仰望，栩栩如生。

龙纹砂铫子是楚菜食具的代表，富有重要的历史人文价值，不仅见证了武汉餐饮老字号的辉煌，也记录了传奇人物的过往。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高度关注武汉发展，先后莅临江城视察，其间也品尝过用龙纹砂铫子煨的汤。

南极石

这一块神秘而美丽的南极石，来自冰雪覆盖的南极洲，由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从中国南极中山站采集而来。2010年，南极石随着中国“雪龙”号科考队从南极运抵上海，航行约2.2万公里，历时28天来到美丽的江城。参加中国第26次南极科考的武汉商学院2008届毕业生潘鼎和2009届毕业生徐康、王琪，代表南极中山站将南极石赠送给母校。

南极石学名“片麻岩”，是中国南极中山站的标志性岩石，距今约5亿多年。南极石表面呈黄褐色，经过数亿年的风吹雨打，布满了剥蚀后大小不一的孔洞，呈现明显水冲石的特点，也磨砺出了它独特的形态风韵。

自1984年，中国政府组织首次南极考察

至今，已走过近40个春秋。一代又一代的考察队员，奔赴遥远的冰雪大陆，在严酷的环境中，经受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挑战。“别的国家能做，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这种精神在考察队代代相传，战胜层出不穷的困难，取得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使中国在极地政治、外交、科学研究、资源的和平利用和环境保护等国际事务中，取得和维护了应有的地位和权益。

这块南极石虽历经沧桑巨变，依然嶙峋坚硬，石韵悠然，见证着中国南极科学的研究历史，体现着南极科考队员坚如磐石、默默付出的务实精神。

2021年，在外交部湖北全球推介活动“外国网红解码幸福武汉”大型融媒体采访活动中，武汉商学院校史馆楚风汉韵的特色展陈成为唯一高校站点，接待了英国皇室安妮公主、泰国皇室思蕊梵·娜瓦瑞公主、国际军事体育会理事主席赫尔维·皮奇里洛等外国贵宾。

2022年3月，武汉商学院校史馆被中国科协评选为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以此为平台，联合文化传承人，创办各类文化课堂，将非遗文化、地方民俗等多样的优秀文化纳入课堂内容，为学生及公众带来多姿多彩的沉浸式课堂体验。

范勇，武汉商学院校史馆馆长助理